



# 目 次

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杜光嶺 傅啓學 鄭震宇	吳俊才 鄧公玄 孫桂籍
越南剿共戰爭的政治因素		呂律 關德懋等
透視日匪貿易		黎世芬
匪俄在新疆的尖銳衝突		朱少先
共匪對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風運動		朱文琳
本年大陸小麥收成的觀測		餘生
共匪積極修建戰略交通線		覺生
蘇南關係新階段與今後的發展		柳乘
葉門與南阿的演變和趨向		谷音
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上)		湯德衡
蘇俄動態述評		張貴永
①糧食與蔬菜嚴重恐慌。		一心
②加強中等專科教育。		
③俄外長在聯大演說要點。		
④俄英貿易。		
⑤對外其他活動。		
每月大事記		張伯淵
編後記		汪學文
		編者

# 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 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次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本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二時，假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本所會議室，邀集學者專家二十餘人，舉行第六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計出席杜光墀、吳俊才、尹慶耀、湯德銜、傅啓學、陳瑩、孫桂籍、鄭震宇、鄧公玄、朱少先、馮達、關素質、呂律、劉岫青、關德懋、張棟材、姚孟軒、宋鳳恩、孫德湘、王先鑑、王懷中（簽名次序）等二十餘人。由本所副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茲依當日發言先後，將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請位先生：今天本所舉行第六次學術座談會，討論「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在大颶風之後，承各位在百忙中抽空參加，十分感謝。本所主任卜道明先生因出席聯合國十八屆大會赴美，行前特囑本人敬向各位致意。今天所討論的題目，就時間上說，如從一九三三年美蘇建交開始，共有卅年歷史；就空間上說，可以說包括了以美蘇關係為重心的全部國際關係。在沒有討論之前，先請鄧公玄先生就題綱向各位作個說明。

鄧公玄先生：

今天預定討論的題目為「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在此一大題目之下，又擬了五項子目，即：（一）一九三三年美蘇建交的背景：美國在蘇俄革命後，一直未與之建立邦交，未建交以前，美蘇之間當然沒有什麼正式關係，可是為什麼在一九三三年忽然恢復邦交，其背景如何，很值得我們加以研究。（二）二次大戰前的美蘇關係：從恢復邦交到二次大戰前，美蘇的關係雖然已恢復正常，但兩國似乎是很泛泛的，其中的情形，也值得研究。（三）二次大戰時的美蘇關係：在二次大戰中，美蘇關係才開始頻繁，而且在此時

期的許多措施，實為後來冷戰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加以了解。（四）二次大戰後的美蘇關係：至於大戰結束以後，美蘇關係便一變而為影響全球的關係，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冷戰，實際就是美蘇關係的全部縮影，當然更值得我們加以探究。（五）美、英、蘇三國禁試核子條約簽訂後，美蘇關係的展望及對我國的可能影響。這是現在我們所遭遇的階段。現在三國禁試條約簽定了，這表示冷戰有了空前的新轉變，當然也就是美俄關係的空前轉變，這種轉變在在與我們有密切的關係，尤其值得我們加以研究，這也是我們這次座談會的主要目標。

主席：謝謝鄧先生對題綱作了說明，題綱不過供各位參考，各位

發言儘可不受此限制。各位先生的發言，我們將記錄下來，再送各位過目後，在下一期的「問題與研究」月刊發表。現在請各位踴躍發言。

呂律先生：

關於一九三三年美蘇建交的背景，我個人所知道的很有限，大致是蘇維埃政權，自一九一七年建立以後，外交上最重要一項任務是誘騙世界各國的承認，但是美國堅持不承認的立場達十六年之久，到一九三三年底始正式與蘇建交。

美國是與蘇俄建交的最後一個大國，若按各國與蘇俄建交的先後次序來說，它又是第二十五個承認蘇維埃政權的國家。

美蘇兩國的建交，在當時確為整個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它增加了俄共赤化世界的機會與可能性；抬高了蘇俄的國際地位；擴大了蘇俄的對外貿易，從而有源源不斷的機器設備進口，以加強它的經濟建設，也就是國防建設。所以，莫洛托夫會就美蘇建交一事指出，這是蘇俄對外政策的一個重大成就。

美國堅持不承認的立場達十六年之久，終於放棄，其間原因雖然不甚簡單，但美政府當時為國內外大勢所迫，不得不變，殆已毫無疑義。以當時美國國內的反應為例：

(一)一九三〇年美國裝備的輸出，蘇俄佔第二位。一九三一年蘇俄輸入的美國拖拉機佔其全部輸出的五分之四，金屬加工機床佔其全部輸出三分之二左右，掘土機佔其全部輸出三分之一左右。但自一九三一年以後，蘇俄為迫使美國接受其復交的要求，轉向歐洲市場訂貨。

(二)根據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當時美國全國報紙贊成與蘇俄建交者，佔百分之六五，而反對承認蘇俄者，僅佔四分之一。

(三)一九三三年一月，代表三百所美國大學的八百位美國教授函請羅斯福總統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

於是羅斯福總統為順應國際大勢與國內輿情，決定改善美蘇關係。但羅斯福最初的主張，祇限於美蘇關係作某種程度的改善，并未打算立即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所以，當時美國祇與蘇俄派駐美

國的美蘇貿易公司有所接觸，并未舉行正式的建交談判。

美政府所採取的從貿易上改善美蘇關係的談判，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夏，但因蘇俄方面要求建立法律上的外交關係，不同意美國祇建立事實上的外交關係，於是談判一度陷於停頓。

一九三三年秋，羅斯福總統決定舉行兩國外交代表談判，於是美國國務院開始認真準備，研究蘇俄與其他各國建交條約，并提出一個「凱里備忘錄」。在這個備忘錄中簡述一些美國與蘇俄建交所應依據的原則，諸如：蘇俄必須發還沒收美國公民的財產及首先解決一切爭執問題等等。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羅斯福致函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建議舉行兩國建立正常關係談判。蘇俄立即答復，表示同意，同時派當時的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銜命赴美。

美蘇建交正式談判自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開始，至十六日結束，通過換文，建立起美蘇之間法律上的外交關係。

美蘇雙方的換文，係包含與建交有關的一些協議，也就是：

(一)雙方互相保證尊重主權，決不干涉對方的內政。

(二)保證不採取旨在引起或鼓勵對另一方武裝干涉之一切行動。

(三)兩國政府保證不建立、不資助、不支持旨在與另一方作武裝鬥爭的任何軍事組織或軍事團體，并保證絕對防止上述組織或團體招募人員。

總之，美蘇的建交，不但在實質上開闢了蘇俄與歐美一些國家建交的新時期，而且假如美蘇之間一直不建立外交關係，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根本即無可能實現有美蘇同時參加的軍事同盟，蘇俄亦無由得到美國大量的軍經援助，并且更無可能在這個基礎上轉敗為勝。

社光瑣先生：

美蘇建交是在一九三三年，蘇俄共產革命之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其間有十六年之久，美蘇二國迄未建立邦交，原因何在？同時，我們再看一看西歐方面的美國幾個重要友邦，英法兩國都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期間先後予俄國以承認，英法之與俄建交要比美國早

了將近十年，美國對俄建交較之英法兩國晚了十年之久，其間原因非常複雜，有經濟的，政治的，政黨的及政治家個人的等等因素，現在略微一一加以說明。

美國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蘇俄共產革命以後，其重要政策：(一)爲顛覆資本主義國家，其主要對象當然是美國；(二)勾銷一切債務，包括國家及私人的債務，使美國公私雙方蒙受損失很大。由於以上的原因，使得美國拒絕對蘇建立邦交。我們再回顧一下，英法兩國在當時也是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與蘇俄也有債務關係，俄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向法借債更多，爲什麼英法兩國會在一九二四年前後不顧債務的損失及共黨的顛覆而率先與俄建交，這也有他的政治因素。

英法在一九二四年前後與俄建交，一部份是國內政治因素促成的，英國一九二三年勞工黨上台，麥克唐納執政，一九二四年法國急進社會黨成立，中間偏左政府，歐里奧出任內閣總理。英法兩國的政府都含有社會黨的色彩，與俄國比較接近，因此承認了蘇俄，並與之建立邦交。

美國在一九一七年蘇俄政權成立後十六年才予以承認。一九二〇年美國共和黨執政直到一九三三年，該黨執政十二年當中的三位總統哈定、柯立志與胡佛，他們都比較保守一點，其內外政策都爲資本家所左右，他們對蘇俄勾銷對外債務，反對尤爲激烈，同時對於蘇俄的顛覆政策亦深懷戒心，因此對於蘇俄政權遲遲未予承認。

另外還有一點是政治家個人性格的因素，一九二〇年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勝利，哈丁出任總統，當時的國務卿休士 Charles Evans Hughes 精明強幹，威望很高，同時哈定本人沒有什麼政治經驗，因此當時美國的對外政策都受休士的影響，據個人記憶，在那一個時期休士幾次發表言論表示：「蘇俄如果不取消其顛覆政策，並改變其勾銷對外債務之政策，絕不予以承認」。當時在參議院中重要領袖們如波拉(Borah)的意見亦與休士相同。從這裏可以看出美蘇邦交斷絕十六年之久，其原因很多，政黨及政治領袖性格與意見亦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民主黨勝利，由羅斯福出任總統，在

美國政治史上爲一劃時代的變化，對於蘇俄之關係，也改變了十六年來不承認蘇俄的一貫政策，這一項政治上的重大轉變，當然與羅斯福個人性格有關。他的知識與瞭解都受自由主義的影響，因此他的政策趨向自由主義，實行「新政」New Deal，改變了共和黨政府時代許多內外政策。由拒絕承認蘇俄，而予以承認，也就是所改變的對外政策之一端。

當然誠如剛才呂先生所說的，美蘇貿易亦有很大的關係，美蘇在建交前，雙方貿易率非常低，每年約在一百三十萬美元上下，與歐洲諸強相比，等於英俄貿易的四分之一，德俄貿易的十分之一。到了一九三二年美蘇貿易達到最低潮，與英法德對俄貿易相比更趨減落，美國在一九二八—三二年曾發生過經濟不景氣，到了羅斯福總統上台以後，實行新政，對內方面則是努力恢復經濟生產，穩定社會制度，對外方面，設法對俄建立邦交，對美國經濟貿易也多少有點幫助，再加上國內一般商人，爲利益所趨而要求政府與俄建交，因此經濟原因也是促使美俄建交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政治、經濟、政黨及個人性格等因素外，促成美俄建交，更大的原因爲一九三三年整個的國際局勢之變化。這種情勢可以分東、西兩方面來說明。

西方是德國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卅日上台，使德國政治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同時也使整個歐洲起很大的波動。儘管希特勒在初期並沒有馬上撕毀凡爾賽和約，侵略萊茵河，但是在「我的奮鬥」一書中，很可以表示他的堅決的反共思想，使得俄國感到莫大的威脅。從此國際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右傾的獨裁政權，與蘇俄成爲勢不兩立的勢力。

在東方一九三一年日本在我國發動九一八事變，接着一九三二年發動一二八事變，成立偽滿政權，以及一九三二年日軍進侵熱河，日本軍閥這一連串的軍事行動，不僅是囊括我東北，席捲內蒙，並且也威脅到蘇俄。蘇俄在九一八之後，西方受到希特勒之震動，東方又感受日本在我國東北軍事行動之威脅，在東西兩面壓力之下，爲了本身的利害，很需要友邦的支援。另一方面美國對於日本的侵略中國也感到極甚惶恐，因此而有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以及許多

次對日抗議，美蘇兩國因為都面臨希特勒和日本威脅，雙方都有建交的意圖，而俄國在東西雙方受到壓迫，對美建交似乎更為迫切，因此不得不改變共產主義的對外政策而與美國謀取妥協。

因為上述各種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及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美蘇乃於一九三二年正式建交，而結束兩國十六年來斷絕邦交的狀態。

### 傅啟學先生：

本人對於二次大戰期間的美蘇關係，願提出一點意見，請各位先生指教。二次大戰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爆發的。為什麼會爆發二次大戰呢？這是由於德國進攻波蘭引起的。為什麼德國會進攻波蘭呢？這是由於德蘇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的結果。所以第二次大戰的發生，蘇俄實是策動的主角。

第一次大戰以後，美國實行孤立主義。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中立法案」，是美國實現孤立主義的政策，對交戰國雙方實施戰略物資禁運；德國若進攻英法，美國對英法不能援助。至一九三九年歐戰發生，美國修改了上項中立法案，由「禁運」改為「現款交易」(deal in cash)，部份地開放了對戰略物資的輸出；至一九四二年法國戰敗，美國則澈底變更了是項禁運政策，由「現款交易」改為「記帳方式」(deal in credit)，這樣，使美國充沛的戰略物資，源源大量地供應歐洲盟國。所以當時美國對德國未正式宣戰，實際上已不宣而戰了。

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希特勒撕毀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攻打蘇俄，當時，納粹的氣焰頗盛，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俄軍大敗，幾至無法支持。羅斯福總統為援助蘇俄，派其私人代表霍浦金斯(Hopkins)往晤史達林，保證在物質上竭力予以支援，並保證在一九四二年內開闢第二戰場。自此，美援物資大量湧向俄國，終於挽救了蘇俄的命運而扭轉戰局。據中國所得情報截至一九四四年底為止，美國援華物資總量為二萬噸，而援俄物資總量却高達二百萬噸之巨，較美國援助中國物資多一百倍。

美英諸國雖竭全力支援俄國對德作戰，但史達林因第二戰場遲

未開闢，對美英之態度仍頗冷淡，對西方未能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公開的表示不滿。

一九四三年十月，美英蘇三外長會議，據美國國務卿赫爾稱，史達林表示，只要一旦打敗德國，俄國即可對日宣戰，並未附有什麼條件。但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產生了所謂「雅爾達」條約，犧牲我中華民國的利益，這實在應歸咎羅斯福總統的疏忽與無識。因為當時羅氏只重視打倒德日，沒有顧及蘇俄戰前的陰謀，也沒有顧及戰後的和平，致造成戰後蘇俄的猖獗，使美國窮於應付。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德黑蘭三巨頭會議中，英首相邱吉爾曾提出主張，由希臘進兵多瑙河，羅斯福對蘇俄沒有警覺，對邱吉爾建議未加重視。如果當時羅斯福能採納邱氏主張，則今日東歐的局勢必將改觀。

一九四五年，大戰結束，德國無條件投降後，美國杜魯門總統要求中國與蘇俄簽訂條約，對雅爾達密約兌現。但蘇俄違反與蘇友好協定，美國亦毫不過問。蘇俄違約不撤兵，致導致中國大陸的淪陷。

大戰結束後，美國全部復員裁軍，蘇俄則否，除囊括東歐附庸外，其勢力並節節向西歐擴張進逼，希土等國首當其衝，一九四七年七月始迫使杜魯門總統以四億美元援助土、希兩國。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當然是美國與西方的一大覺醒，但北約組織是一個防禦性組織，只是美國防堵政策的開始。

在二次大戰結束初期，美國以其極度富強的國力，並獨霸原子武器，本可支配全世界而有所作為。可惜美國非但沒有把握此一良機，令蘇俄坐大，佔盡便宜，這些都是由於美國缺乏深謀遠慮的人才所致。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說服美國並影響美國，使其不致一錯再錯，這是大家今後應當共同努力的方向。

### 鄭震宇先生：

英國對於外交政策十分的重視，蘇俄也自有其獨特的外交政策，唯美國則似乎尚末有一貫的明顯的外交政策。兩次大戰中，美國

日漸富強起來，成爲自由世界的兵工廠，美國人個個發戰爭財，他們雖有犧牲，但比起歐亞兩洲便要好得多了。

英國外交不僅有長遠的政策，而且有一時的目標，它的政策便是可交則交，不可交則在你未死之前把你活埋掉，亦所不惜。二次大戰以後，我國駐英大使在任數年，一直默默無聞，等到英國政府決定承認共匪爲政權，英國外交部找鄭大使去當面告訴他時，他說了一句話，却因此一語成名。他說：「我還沒有死，你就把我活埋了！」(You British people bury us while we are very much alive.)

第二天倫敦報紙以橫幅大字刊出此語。我當年自國外歸來，蔣百里先生約見兄弟，以留學心得見詢，我道出「不能爲敵，即不能爲友」一語，深獲讚許，此即英國外交之主旨所在。蘇俄外交也有目的，這一個目的便是稱霸世界，他們是不斷地前進，前進，走不通時，無論左轉彎或是右轉彎，甚至向後轉打一個滾，回頭過來，仍要前進。可是美國便沒有這些，我讀美國歷史，教「美國政策」，覺得美國一方面仍舊保有十三州時代的崇高理想，一方面却又非常實際。美國在大戰時確幫助了俄國，共同贏了戰爭，但其存和平時期的對俄政策，要對今日的世局負重大責任。美蘇一九三三年復交，原因雖包括政治、貿易乃至領袖人物的意圖，但是受當時國際形勢重大的影響是主要因素，就是說日本九一八的侵華，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一月的登台。此次因恐懼中共擁有原子彈，乃將對蘇政策迅速轉變，致使其他因素均居於次要，以此來維護其本身安全。英國人反共本是最堅決的，但當希特勒崛起時，第一個打電報給史達林的便是邱吉爾。美國的「不承認主義」根本不成爲政策，既乏積極性且因其事實的存在便不能不終於有所交往。如對方可能爲敵，不是當其未存在時先窺息它，便是在其存在時造成某種形勢，使其不致危害到自身安全。美國在二次大戰前的外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有她的政策，同時也可以說是無政策。每次大戰，總是觀望不前，直到一方面說直接威脅自己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她能決定戰爭時才參戰。第一次大戰中，到一九一七年才參戰，站在同盟國這一邊。如果在戰前有明確的態度或已早就參戰，大戰或根本可能不致發生，即便發生也很快結束。

### 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說到二次大戰中的美蘇關係，不能不說聯軍在歐洲登陸登錯了地方。這是一件極端重要的事。當時邱吉爾主張在巴爾幹半島登陸，一面側面攻擊希特勒，另一面也防阻史達林。羅斯福對俄深信不疑，所以反對邱吉爾的近東政策，主張在諾曼第登陸。羅斯福太天真，他以爲俄國地大人多，戰後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絕不可能迅速崛起，更不可能從事侵略。邱吉爾主張在希臘登陸，乃是一箭三鵰，真至善政策，攻德防俄，免本國基地之摧毀。但是羅斯福以爲希臘太靠近俄國，在希臘登陸足以反映英國傳統的恐懼蘇俄南下的政策，容易引起蘇俄與西方的不愉快，所以堅持在諾曼第登陸，使歐洲戰場的結局爲之改觀。邱吉爾的遠見并且表現在接受德國投降時，當時他會有命令給蒙哥馬利元帥，告訴他準備隨時可以用接受德軍投降武器打俄國人。在這些地方，美國人便不如英國人的很有遠見。

蘇俄本無與人共存或樂於與人爲善的心，更無所謂道德，凡是能達到目的的手段都符合他們的道德。因此，他們的手段雖然常常變換，但是最終目的永遠不變，這樣便使美國疲於應付。

我嘗對美國人說：我愛美國，因爲沒有你就沒有我，愛你就是愛我。可是美國人說話便不如此，九月三日赫連迪總統在其有關越局的談話中，口口聲聲說要越南改變政策，并說「那是他們的戰爭，必須贏得勝利或遭受失敗的是他們」。既是完全是他們的戰爭，美國人則爲何而來？更何以要干涉？這種談話，雖是針對越局而發，但其影響却遍及整個世界，如此說法，自不能受人歡迎。反之，共產黨人便懂得這種道理，譬如劉匪少奇在訪問察國時便說：「你說我幫你忙，不！我說你們幫我忙，你們現在反對帝國主義，建立獨立國家，在這裏打前鋒，正是幫我們的忙，我們是打一場共同的仗。」這種說法，叫人聽了多麼開心，可是美國人便不懂得如此做。總之，美蘇外交關係中，美國常常無一定之目的，而蘇俄則有之，根據美國教育考察團的報告，那就是「趕上并且征服美國」(Catch up and overtake America) 所以美國安得不吃虧。

關於核子力量，最近美國讀者文摘九月號發表了一篇 Francis Vivian Dake 的文章，比較美蘇兩方的力量。美國人自己承認說：

美國現在危險極了。這就是美國人缺乏遠見的結果。早在一九四六年九月，邱吉爾根據情報判斷說：今天西方有原子彈，而俄國還沒有，必須在它沒有原子彈的時候和它攤牌，否則三年以後，俄國也將擁有原子彈。果然三年以後，也就是一九四九年，蘇俄便有了原子彈。美國人始終是抱「人不打我，我不打人，但是如果人打我，我必能打倒人」的觀念。許多年來，美國國會的證詞中，充滿了這種論調。但是現在太空戰爭中，幾秒鐘便能使美國毀滅。如果有人問甘迺迪，等到別人打了我們再報復，豈不等於在別人打死我們以後再還手？試問甘迺迪將如何以對？這種新形勢，正說明美國人無謀略。政治本來脫不了力量，是爲了實現自己國家的政策和抱負，同時也應該是爲了人類的幸福。但是，不幸，我們始終在歷史上只看到有「偉大的英國人」，有「偉大的美國人」，偉大的某某國人……，而不容易看到「偉大的英國人或美國人而同時又是一個偉大的人」。

當年聯合國初創時，英國人主張聯合國雖然成立，但對地區性協定仍應重視。當時我們許多人都不贊成此種觀點，不主張把地域性協定估價過高，堅持要使聯合國成爲名符其實的維持全世界和平的機構。可是英國人不僅在戰時能影響美國武力的使用，并且在平時能使美國武力用來保衛西歐，簽訂了北大西洋公約，聯合國的價值便喪失了許多。由此看來，條約并無重要性，重要的是形勢，失去了形勢便要失敗。外交就是講形勢，要保持有利形勢，更要不斷創造有利形勢。

近幾年來，我國外交人員爲保持在聯大的席位，盡了很大努力，使人非常欽佩。但是最大的努力，必須是最善的努力，才有價值。過去，哈瑪紹担任聯大祕書長時，主張一切重要國際會議都要在聯合國裏開，此點我很贊成。這一次禁核談判，我們便應如此主張。字諱未能堅持在聯合國內簽約，應屬失着。雖然如此做亦未必有多大效用，但「禮拜堂裏不好公然談男盜女娼」，多少總有一些影響力量。

這個禁核條約，談判了許多年都沒有簽成，此次僅僅十天時間，便談判成功，主要是因爲美國怕中共有原子彈，蘇俄更怕中共的

形勢造成的。正如當年柏林被封鎖時，我在聯大中國代表團當顧問，兩次碰見馬立克與 Lessard 在一起喝酒，喝酒本是小事，但其時其人在一起喝酒，便是別有含義。果然三星期以後，柏林封鎖撤除。記得俾士麥說過一句話：「第一流人才與風作浪，第二流人才乘風破浪，第三流人才怕風浪、避風浪」。有人說外交怕沒有風浪，當年我讀外交時，便有這個體會。現在我們不能與風作浪，我們至少要做到乘風破浪，我們假若不是第一流人才，至少第二流，國家前途庶幾有望。

今天，在不違背國家利益下，我們應運用各種外交的力量促成推翻匪偽政權。以往沒有時機，尚有可言，現在有了時機，爲何不用？我們應當說服美國人，使這一個重要的朋友重視此種情勢，共同策動。有人說外交便是說服，說服便是外交。最大的努力必須使其成爲最善的努力，唯有最善的努力才能解決問題，對國家才有用處。我以此期望國人，更以此呼籲政府當局。

### 孫桂籍先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但是沒有獲得世界的和平。一九四五年德日投降以後蘇俄成爲時代的主要挑戰者。迄今十八年來蘇俄一直以美國爲其主要敵人。人們稱過去十八年是冷戰時代，所以回顧戰後美蘇關係，亦即以美蘇兩國關係爲主要背景的世界冷戰局勢之發展和演變加以回顧；大體說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四五—一九五〇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祕約，以及七、八月的波茨坦會議對於二次大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插，是目前這冷戰時代的肇端。美國羅斯福總統於雅爾達密約簽訂後兩日不到的時間逝世，使蘇俄的野心更加狂妄。同年五月與九月德日投降，蘇俄對美國的衝突立即表面化。針對所有戰後問題，蘇俄處處跟美國採取了反對的立場。美國方面經過兩年多時間，人們只能意識到美國所求的是和平與安定，而對於蘇俄的野心與企圖却完全缺乏必要的瞭解。蘇俄外長莫洛托夫以及蘇俄駐聯合國代表對美國的公開叫罵曾使美國人驚愕；當初美國人的態度，至多只會是以



「No」答覆，蘇俄的「Nyet」，殊不知在俄國說的「Nyet」後面還隱藏有向戰後自由世界挑戰的現實性的危險的陰謀和計劃。一九四七年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在西德 Stuttgart 宣佈美國對德國問題在蘇俄的挑戰之下將不再考慮四強一致同意的原則，可以說是個新的里程碑；那時候俄共第二號會首日丹諾夫却早已率先向全世界宣佈了所謂「美蘇兩大陣營敵對鬥爭時代已經到來」的警報——揭開了冷戰時代的歷史帷幕。同年，以巴爾幹、希臘危機為契機，美國才開始採取行動遏阻蘇俄的擴張與威脅。從此有杜魯門主義的誕生，杜魯門建議美國國會迎接「援助自由人民抵抗少數武裝分子和外來壓力的征服——幫助自由人民維護自由制度，維持國家完整和對抗極權的侵略」之任務。隨後又有馬歇爾計劃被提出。一九四八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援外法案，並配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談判的成功，美國給西歐的重建與防禦提供了具體的保證，使歐洲在蘇俄的挑戰下站穩了腳步。

一九四九年九月，蘇俄的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十月中共偽政權在北平登場，亞洲局勢丕變。既至蘇俄東歐附庸先後粉墨登場以後，共產與自由兩大集團表面形勢的對比，改變了戰後世界景色。一九五〇年夏天韓戰爆發，蘇俄開始迫使美國在全球範圍採取實力步驟，冷戰乃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上述冷戰第一階段裏，戰後第一個六年當中，美國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歐洲。結果，却在亞洲犧牲了中國，並惹出了韓戰。在歐洲亦未能阻止東歐各國之淪於共產鐵幕；並且，因為在亞洲失掉了中國大陸，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便失掉了最可靠的保障。一九四八—四九年的柏林危機，美國原本應當獲得教訓，並應該領悟蘇俄一貫是欺軟怕硬的，在優勢的壓力下，蘇俄的擴張是會被制止或擋退的。奈何美國不能主動把握機會，實踐這教訓保衛全世界的正義與自由，劍及履及貫徹美國的政略目標。彼時 G. F. 肯南是美國因應蘇俄冷戰攻勢的設計人，他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的「蘇俄行動的起源」一文對國際共產運動，結合俄國歷史傳統所作的研析及所提出的若干觀點，反映了並長期的影響了美國的對外政策。肯南對蘇俄挑戰就歷史文化觀點所作的分析，固多不可厚非之處。

### 美蘇係的關演變與發展

，但其對於戰後美國對蘇政策所加的實際影響却是消極的，而且在若干方面亦可以說是極不利的。

由韓戰開始到匈牙利反共抗俄革命的流產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六年是冷戰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國際間所發生若干巨大變化：

(甲) 美國在自由世界爭取盟友的活動獲得長足的進展，並且開始轉移部份的注意力到歐洲以外的地區。一九五一年美洲國家組織成立；美國國會通過了共同安全法案，在美國的主動下簽訂對日金山和約。一九五二年簽訂美菲、美澳紐條約；土希兩國加入北約組織。一九五三年簽訂了美韓安全條約。一九五四年簽訂中美安全條約。同年日內瓦會議斷送了北越，淪於共產之手；另一面却成立起東南亞公約組織。一九五五年巴格達公約成立。美國初步結成了它敵禦蘇俄擴張的國際防禦體系。

(乙)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繼杜魯門出任美國總統。同年在蘇俄方面因史達林之暴死，克里姆林宮的政治情勢表面上出現了若干顯明的變化，並掌握了氫彈。——以上述幾件事情為轉捩點，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六年冷戰高潮迭起，把整個國際局勢推進到新的階段：一九五五年的日內瓦高峯會議，同年秋天開始的美匪大使級雙邊會談；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的背景，俄共二十大大會——鞭屍史達林運動，匪俄間之分歧，黑魯曉夫力謀與南斯拉夫狄托修好，以及波蘭的抗蘇事件，匈牙利的革命等等對於時代冷戰都具有深厚的意義與不同尋常的長期影響。

上述第二階段冷戰六年多的時期所形成的趨勢：第一、事實證明美蘇雙方既不能面對面直接交手以戰爭解決問題，也不能面對面以和平談判緩和緊張局勢。終於使冷戰出現了僵持狀態，使國際間有了所謂中立主義的抬頭。第二、美國實力地位隨着它全球基地體系的形成而增強，但其基於圍堵政策遏阻共產侵略的大孤形體系，僅僅具有防禦之功能，永遠不可能從根本上屬轉大局。第三、共產集團出現了破綻，但其整個國際結構體系在表面上仍有維持平衡的彈性；從另一方面正好襯托出美國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的解放政策，經不起事實的考驗，使鐵幕內嚮往自由的人們大失所望。第四

、一九五五年七月的日內瓦高峯會議說明美蘇雙方的冷戰政策，均不以總體戰爲其終點，但是在所謂「恐怖平衡」與「核子僵局」下，長期的激烈的核武器競賽則不能避免。

一九五七—一九六二年是第三個階段。一九五七年蘇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斯卜特尼克」發射成功。這一事件雖然未能從事實改變美蘇雙方的實力對比，但初期使西方國家在心理上受了相當的困擾，好在很快便恢復了平衡。美國在太空競賽方面的一連串後來居上的表現，爲人類啓開了進入太空時代的鎖鑰，這是美國對世界的歷史性的卓越貢獻。同時也使人領悟今日世界的主要危機，仍然是在這星球的地面，還不是在渺無人烟的太空。一九五七年美國出兵地中海挽救了約旦的危機，一九五八年我中華民國在金門隔海粉碎了共匪發動砲戰軍事性與政治性的兩面企圖，從根本上扭轉了自由世界在亞洲反共戰場上的形勢。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艾森豪與黑魯曉夫的大衛營會談，到一九六〇年五月發生美國C-119飛機進入蘇俄領空事件，同月，巴黎高峯會議流產，短短八個月的時間美俄關係經過了一百八十度兩極性的轉變。在這一期間匪俄關係也展現了嚴重的裂痕。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國際冷戰局勢全面緊張起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有動亂發生，承平的歐洲在東柏林也築起了圍牆。到一九六二年底先後發生了古巴危機、匪印衝突，與匪俄關係惡化幾件大事，使冷戰全局與美蘇關係又急劇的轉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

總結第三階段：第一、美國完成了新的全球性戰略性部署的新計劃，但在它大西洋社會的伙伴合作關係之中，也出現了新的困擾，蘇俄與其東歐附庸間的經濟紐帶，正力謀更進一步扣緊。匪俄關係的惡化，却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自由中國反攻復國的機運愈益成熟。美俄雙方在扼制核戰危機方面所達成的初步協議，使冷戰具有了新的內容。顯然雙方今後的政策，都更着重於政治戰、經濟戰與心理戰，把自己的勝利寄望於擴大對方的矛盾與弱點。

如何團結並堅強自己的陣營，問題所關聯的方面愈來愈複雜；除全面核戰以外，循其他一切途徑用以解決局部問題的可能性，重新被獲得落實考慮的機會。瀰漫於事象表層的美蘇妥協空氣，並沒

### 本刊徵稿簡約

(8)

八

(一)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三)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爲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註明。

(五)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中央日報大廈七樓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一八九號。

有足够的證據證明冷戰在解凍！自由中國復國的信心更堅定，承認世局在影響我們；我們主觀的努力也在影響世局的發展。

關德懋先生：

茲就第五項題綱：「美、英、蘇三國禁試核子條約簽訂後，美蘇關係的展望及對我國可能影響」談一談。杜、鄭兩位教授的見解都非常精闢。本人謹就所知略爲補充一點。即剛才聽說美國沒有政策的一句話有點感想。美國并非沒有政策，美國的政策一直是受英國的影響。也一直在防範蘇俄。此外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的失策，美國人的天真，是歐洲人所熟知的。

目前甘迺迪領導美國政策，似乎自作主張不再跟英國走了，藉禁試協定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仔細研究起來，協定的本身價值并非如一般估價之高(理由甚明，不必多作評論)。實際上，黑會的收穫，大於西方自由世界。(一)藉此協定穩定他在國內的地位。(二)穩固對衛星國集團的領導地位。因爲除阿爾巴尼亞而外，東

歐集團都怕戰爭。(三)增加其國際聲勢。美英本想藉此為黑會對毛鬥爭中撐腰，結果，黑會不響把東德共黨順手帶進來，造成事實承認的印象。所謂隨此而來的解除緊張，「防止突襲」，真正目的，還是要凍結德國的分裂現狀。儘管如何賣膏藥，如何鬥爭毛匪，何嘗準備對暴力所掠奪到手的土地人民放鬆一步？西方政治家根本不放心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是戴高樂，其次是艾德諾。因此，美蘇繼續談判下去，西德必須把北約組織牽入商討，不容美、英自作主張。據個人的推測，甘迺迪和黑會的互相標榜還要繼續下去，對於自由世界各國來說，這是值得特別警惕的。

### 主席結論

剛纔我們已聽到發言的幾位先生所提出來的精闢見解，只可惜限於時間，在座還有許多位專家學者，沒有能發表意見。我不想再重複諸位已講過的話，我祇想補充一點個人的淺見，請各位指教，但不能算是結論。

美蘇兩國的立國傳統與國情特徵均不相同，而其國家利益與國家目標則又大相逕庭，因此要維持正常的國際關係而不發生衝突，殊非易事。就蘇俄的國家目標來說，從俄共取得政權的時候開始，就是以征服全世界為其最後的目標，而又以美國為其消滅外來敵人中的重要對象。蘇俄在每一階段所採取的對外策略，雖有形式上的變易，但上面所說的這個總的戰略目標，三十年來並沒有重大的修改。因此，蘇俄與美國之間的基本利害矛盾，也就很難徹底消除。

目前，美蘇兩國基於一時的相互需要，就核子禁試問題，達成了局部的協議，這當然是十七年來美蘇冷戰的一個新現象。不過，這種一時的緩和現象，並不能視為從此世界便可永享太平的保證。因為蘇俄既沒有放棄或改變它赤化世界的最後目標；美國也沒有更不敢放鬆對蘇俄可能隨時發動侵略的戒備。個人以為我們衡量未來的美蘇關係，不管目前有甚麼一時的變化，而這個基本的問題是不能輕輕忽視的。

今天謝謝諸位先生的光臨；今後我們希望常有機會再向諸位請教。散會。

美蘇關係的演變與發展

# 報日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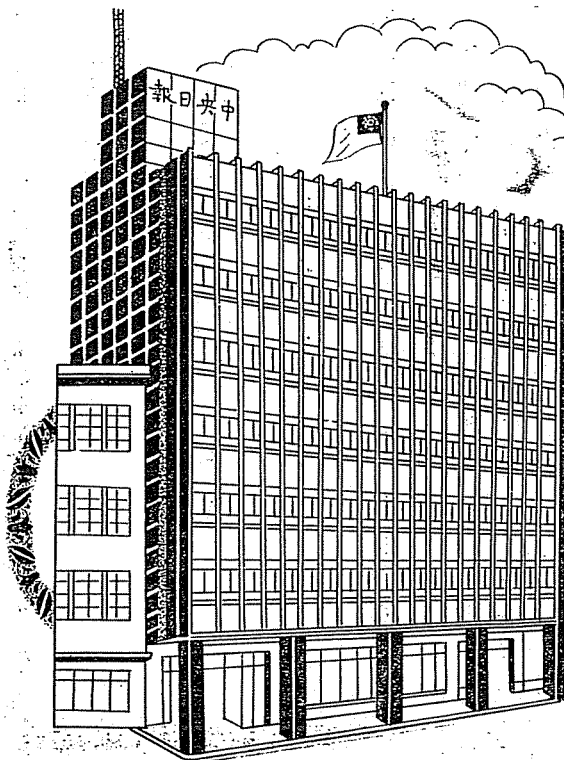
人國中有部地各界世  
有就方地的人國中有

報日央中

版空航際國行發

元四金美月每份每寄航：美歐  
(元〇六一幣台新) 訂  
元一金美月每份每寄航：洲亞 價  
(元〇六幣台新)角五

號五九七一一路正中市北台：址 社  
七五〇八二·三五四六二：話電報訂



# 越南剿共戰爭的政治因素

當前越南危機的癥結所在是政治，解除此一危機，端賴有卓識、遠見和毅力的政治家。這些努力，一半靠西貢，另一半靠華盛頓。

——黎世芬——

## 一 越南剿共戰爭的本質

剿共戰爭必須是政治、經濟和軍事三種手段兼具的綜合戰，這種看法，在今日越南的剿共戰爭中，特別有其必要性和決定性。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日內瓦協定，不單給了越南以獨立，也給這個古老的東方民族以新的災禍，一條北緯十七度線，把它平分成兩半，一半給它關進鐵幕，一半給它以新的生命。這個新生的國家，並未因為日內瓦協定帶來和平與繁榮，相反地，它成了自由世界和共產集團冷戰和熱戰的雙重交鋒面。戰火沒有停熄過，冷戰跟着全面地展開。

十七度線以北，是國際共產黨南下的試驗區。胡志明在河內建立了東南亞的第一個共黨政權，他引進了中共匪幫和俄共的勢力，更建立了柬埔寨和寮國兩共黨的軍事政治策源地。國際共黨在毛澤東與黑魯曉夫的爭權鬥爭下，發展了彼此的矛盾；同時，也共同地合作以推進它們的南下政策。在「和平共存」、「反帝」、「反獨裁」的口號下，越共開闢了胡志明的棧道，並建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八年來，由人數不到四千人的游擊武裝，擴充到擁有三萬人以上的正規部隊和游擊隊，根據地也由接近西北山區和水

草平原而擴大到西貢的近郊。這說明一個方向：國際共黨的心目中沒有任何條約、協議、承諾，它們的目標是赤化全越南，佔有全越南。這個原則本是一個既定的路線的一部份，國際共黨從來沒有停頓過，今後也不會因為任何理由再停頓下去。

十七度以南的越南共和國既被寄以負擔穩定世界局部和平的希望，它便在反封建、反殖民、反共產的三個口號下開始建立它的政府組織。本來任何一個近代國家的建立，都必須經過一個痛苦的難產階段，付出相當的代價，不過有些國家有着長遠的歲月，讓他們的政治家從容地去嘗試和學習。而今日冷酷的現實，卻不容許這一新的共和國越南享有同樣的便利。它必須在戰鬥中成長。它一離母腹，便得單獨負起生活的担子。這是越南的悲劇，也是越南的驕傲。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個新的角色，踏入這一政治舞台，那是作為越南最親密最堅強盟友的美國。它向越南派出一個軍事顧問團，並且向這個新興的國家提供鉅額而長期的軍事援助。這兩個國家抱着並肩作戰的決心，計劃把共黨的惡勢力防堵在北緯十七度以北。由於北非的叛亂，很自然地，法國幾乎撤走了它的一切勢力，祇遺留下天主教和法語。美國奮勇地接替了法國的地位——一個已不再有利於殖民利益的重大包袱。

但是吳廷琰總統在內政上的担子却是更繁重的，他必須組織一支統一的國防軍，他必須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清廉政府，他必須建立一個統一的稅收機構，他必須組織一個民主而健全的社會。爲達到這四個要求，吳廷琰總統必須接受高台教、和好教、平川部隊、貴族、大地主、貪官等惡勢力份子的挑釁，和共黨顛覆份子的破壞，於是一連串的叛亂，跟着一連串的平服。這個新生的政權，雖然勝利地平服了所有的叛亂和挑釁，但失敗者和反對者逐漸向羣衆潛伏下去，恰巧爲國際共黨的統戰工作，培養了一個標準的展開「民運工作」的客觀環境。

不幸，在共同作戰的前提下，美、越兩國的合作關係突然起了微妙的變化，緣由美國的立場，是勝利，越南的立場是建國。前者，建立在反共軍事的基礎上，後者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因爲要求勝利，美國希望越南有一個堅強的作戰指揮系統和廣大的民衆基礎，認爲二者是贏得反共戰爭不可缺之要件。因爲要求建國，脫離殖民統治未久，對殖民主義干涉的痛苦記憶猶新的越南，便難以容忍有第二個外國來侵犯它的民族尊嚴，更不容許國內有第二個力量，和外國發生關係。在如此錯綜複雜的環境下，任何賢明領袖的領導，都難克服廣大羣衆的感情衝動。合作的關係上，一旦有了裂痕，便爲敵視美國、敵視越南的敵對份子所乘。加上不負責任的新聞報導，滲入了故意加添的冷戰宣傳，於是，越南的反共戰爭，竟在軍事作戰瀕於轉機之際，出現了新的政治危機。

越南的佛教糾紛，便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並在同一背景下擴大。它既是宗教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同時，也不能不說是政治問題。由於美、越關係的牽入，東南亞佛教國家的起而響應，不幸，它更成了國際問題。就反共戰爭言，它更演變成了反共戰線內部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樁爲「親者痛，仇者快」的大事。

## 二 事件擴大的客觀分析

宗教本來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佛教徒和佛教團體由於宗教狂熱，進而發展成爲政治活動的，在歷史上尚不多見。越南的佛教團體

越南對共戰爭的政治因素

，是在一種和天主教爭平等地位的口號下，展開它的政治活動。這其中有其民族文化的背景，亦有其政治的因素存在。五月八日的一順化事件發生後，越南政府錯過多次地方解決的機會，聽讓這事端擴大，不能不令人歎息越南的政治家對反共戰爭的本質，欠缺足够的了解，而對國際共黨統戰路線的警覺性，顯然不够充分。反共的越南政府和佛教立於敵對的地位，這實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誠然，共黨統治地區的佛教，竟然爲國際共黨所利用，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一切宗教都爲它利用。天主教的教徒和傳教士在鐵幕後甘於犧牲性命，決不屈服於共黨統治的精神，的確值得風範，但這不足以構成鄙薄其他宗教的條件。越南政府沒有本乎動員全民反共的目的，容忍宗教的歧異，革除殖民時代遺留下來對天主教保留下來的特權，以致發生宗教的糾紛，因而失去多少自由世界國家的同情，付出的代價是太大，也是不必要的。

根據各方的報導，順化事件的爆發，祇是因爲撕毀了宗教教旗。東南亞國家由於民族感情的過份誇張，對於在節日懸掛旗幟都有着特別的限制。越南前些年一度的狂熱排華活動，也是從這些小事上觸發的。民族主義的越南政府，認爲任何理由不能讓具有國際性的佛教旗高過象徵國家的國旗。而佛教徒却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即代表東方文化色彩的佛教，無論如何不能低於代表西洋文化色彩的天主教，越南政府和人民，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在反共的立場上都是一條戰線的；但是，一涉及宗教，民族主義便有其突出的感情爲佛教徒所借用。擁有百分之八十人口的非天主教徒於是竟居了上風，越南政府和人民之間之團結，便是在這種條件下脫出軌道之外。

感情是盲目的，但政治是現實的。共黨的顛覆活動者，懂得運用政治的巧妙，去挖掘人民感情的堤防。反過來，反共運動的組織者，更應懂得善用政治的手腕，去導引人民感情與政治合流。波斯的東德人民反共事件和布達佩斯的匈牙利反俄反共革命，便是反共運動家這一政治手腕最高明巧妙的運用。

從社會運動的眼光看，佛教徒是比任何宗教徒更難動員更難加以組織的。但是，看越南的佛教徒，却有一個全國性的團體，更有

週密的地方組織。反共的越南政府沒有把這一組織納入動員的範圍，當然是一個忽略。當佛祖誕辰的慶典，發生警衛部隊與人民衝突之後，順化地方政府沒有採取必要的消防措施，反倒火上潑油，更是失算。因而，一轉瞬之間，坐令此一地方性的寺廟糾紛，轉變為全國性的宗教反抗。這是事件的第一次變質。

吳廷琰總統對於佛教糾紛的解決，曾經有明智的決斷。他曾指派副總統阮玉書、內長斐文量及總統府部長阮廷淳成立三人小組，并以阮玉書為小組召集人，負責專案處理此一問題。六月十五日，政府三人小組與佛教全國代表團達成五項協議：政府同意接納○佛教會可以自由傳教，○保持合法組織，○賠償「五八」事件受傷人員醫藥費，○調查并釋放被拘的僧尼，及○懲治順化事件主犯人員等五項要求，并發表聯合公報。但協議成立未久，雙方竟因公報的技術問題，節外生枝，意見不能接近，接着佛教會發動一連串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於高僧釋廣德當街引火自焚之後，接二連三又有四起僧尼自焚，把羣衆的感情之火，激動地燃燒起來，為佛教爭自由的運動，遂演變成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佛教對天主教的糾紛，遂形成佛教對政府的糾紛。是為佛教糾紛的第二次變質。

八月二十一日西貢突然和全世界失去聯絡，各方都揣測是一次可能的政變已經發生。次日情勢才判明，是越南政府所採取的一次全國性的緊急措施。吳廷琰總統頒佈的戒嚴令包括四項重要措施：

- (一)自二十一日起，全國實施戒嚴。
- (二)政府軍隊負責公共安寧的全責，有權隨時檢查居戶，逮捕一切被認為有妨礙治安的嫌疑份子。
- (三)禁止一切集會，實施新聞管制。
- (四)有違犯公共秩序案件，一律軍法從事。

根據新聞的報導，越南政府不僅動員了政府軍隊，甚至與美國合作訓練用以從事特種作戰的特別部隊，也被調入西貢，担任搜捕和警戒工作。全日行動的結果，約有二千名以上的僧侶、居士和教授學生被逮捕，除西貢的舍利、印光及達蘭等三寺觀之外，當軍隊在峴港的普陀寺及順化的慈潭寺進行包圍檢查時，尚且遭到寺內外佛教徒的抵抗，雙方都有損傷。

在另一方面，吳廷琰總統又頒令將他的軍事機構作必要的人事調整，以加強他對武裝部隊的控制。他命令陸軍總司令陳文敦中將兼代參謀總長職務，并派全國保安及民衛總監阮玉禮中將為副參謀總長。現任戰略村總監的黎文金少將、心戰局長陳子威少將及范春沼少將為參謀總長助理，並分別以黎文金負責軍事聯絡，范春沼監督戒嚴令的執行，陳子威執行新聞管制。除了指揮系統的部署外，又內調第三軍團司令宗室訂少將為首都警備司令，分令第一軍區司令黎文嚴，第二軍區司令阮慶，第三軍區司令宗室訂，第四軍區司令黃文高，總理各該戰區的軍政大權，可以看出，全國自上至下，業已完全進入軍事控制中。

「八、廿一」的戒嚴措施，恰巧發生在美國新任大使洛奇，自美乘專機飛來西貢履任之際。西貢一度謠傳，佛教徒將發動一項示威運動，準備自新山乙機場至美國大使館，以十萬以上的行列，向新任的美國大使表示越南人民的反政府的態度。而美國的通訊社則報導，吳廷琰總統的兄弟吳廷琰將發動一項宮廷政變，代行總統的大權。這兩則新聞都發自事態嚴重的西貢。就前者言，越南政府八月二十一日行動當然是針對而發，至於後者，吳廷琰總統會親自加以否認，認為他的兄弟「無此野心」。從常識去判斷，後者當然不可能成爲事實，但西貢的外國通訊社竟然把這一「馬路新聞」拍發至全世界，在全世界的報紙上刊載出來，這就使得不僅越南政府遭受到打擊，吳氏家庭的人格，也遭受到污蔑，其對於越南反共陣線的影響，是極爲可怕的。另外，「八、廿一」的行動，愈爲激怒了美國和其他自由世界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全世界輿論一致抨擊越南。「八、廿一」的行動，如果真的爲了毀滅一次未成熟的佛教徒示威運動，它是得不償失的，它把一國的內政問題，擴大爲國際震驚的「人權問題」，它使得原來祇可以中傷挑撥越南政府和佛教徒之間關係的口實，嚴重得便利他人更可引以中傷離撥吳總統的家庭，乃至吳總統和越南人民的關係。胡志明北越以及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反而退居其次，不爲人所重視了。這是越南宗教糾紛的第三次變質。

九月二日英文的「越南時報」指控與越南政府多年保持情報合

作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陰謀發動政變，推翻吳廷琰總統的政府，這篇令人震撼的報導，把佛教徒的暴動，指為由中央情報局和共黨煽動的。它說美國耗費了一千萬至二千四百萬美元，企圖策動一次政變而未成功，又指出預定政變的日期為八月二十八日。這篇新聞還牽涉到菲律賓、澳大利亞及大韓民國的駐西貢外交官員。倫敦的星期電訊報根據其駐越記者的報導，則說法國、義大利和梵蒂岡的外交代表，曾試圖於八月三十一日成立一個委員會，以促請美國勿採取任何可能達成此種行動的措施。幾天以後，越南時報又接着報導反吳廷琰總統的大黨領袖阮宗寰已到達華府。據他自己對記者聲稱，他和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已有過接觸，他並且已在越南的中部成立一個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地下活動的戰鬥組織。

越南時報的消息，被認為是吳廷琰對美國要求吳廷琰總統撤換他的還招。這張報紙的主持人是一個美國籍的商人格里哥里。這張以溝通美越兩國人民友誼為主旨的英文報紙，實際接受吳廷琰夫婦的指導。據一張法文報紙訪問吳夫人後的報導，中央情報局發動政變的新聞，是她親筆寫的。美國新聞週刊說格里哥里多時以來，被認為是一個高級的情報員，派來監視吳廷琰夫婦的；可是，現在一變而為忠於吳氏。此人既不為美國所喜，更不為越南人民所喜，但是他夫婦倆出入禁宮，成為吳宅的代言人。他辦的報紙，剛好為美、越友好關係製造出一場大風波。外國通訊社都認為中央情報局可能立即停止對吳廷琰所控制的特種部隊的撥款；但是，這消息並沒有成為事實。

幾天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評論八月二十一日的「西貢事件」，指出越南的陸軍部隊沒有參加。然而，第二天，負責西貢警衛責任的第三軍團司令宗室訂却挺身而出說，戒嚴令的確是陸軍執行的。這是陸軍對國家應負的責任。次日，國務院仍然堅持他的看法，並認為宗室訂的談話，實在是言不由衷。可以看出國務院的用心，在鼓勵陸軍部隊退出對吳廷琰總統鎮壓佛教徒政策的支持。

不管怎樣，越南政府對於佛教徒的非暴力反抗雖然窮於應付，但是，吳廷琰政府的統治權並未如西貢的外國記者的預料的發生動搖。他們解釋，這是吳廷琰接管了軍隊指揮權，並完成對陸軍部隊

的有效控制，有以致之。

美國的甘迺迪總統顯然支持國務院的見解，他在一次電視訪問節目中，對越南政府鎮壓佛教的政策，大為不滿。他認為「越南的逆勢，唯有在政策上甚或是人事上加以改絃更張，才能扭轉」，祇差沒有直接說出更換吳廷琰。九月二十日他更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說，「美國反對全球任何地方，包括我們自己的國家在內，有種族和宗教的歧視和迫害」。而新到任的美國駐越南大使，在晤見吳廷琰總統的時候，曾經懇切地表明美國對吳廷琰的厭惡，並且對逃入美國大使館的三個越南和尚加以保護，美、越兩國因着佛教事件而發生激烈的歧見，至此可謂已達到最高點。越南佛教糾紛問題，影響到越、美關係之外，這是預想不到的第四次變質。

### 三 越南危機的政治性

越南的佛教危機國際化後，首先激起了東南亞國家的反感。親共的柬埔寨帶頭斷絕了她與越南的關係。接着錫蘭、泰國、印度等十四個亞非國家，便聯名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宇譚提出干涉。聯合國大會指導委員會在九月十九日已經通過，決定把越南的佛教爭執案列入議程。

反共的越南政府因為寺廟的糾紛，而在國際上陷於孤立，這是令人可惜的事。無論如何，那不是越南一國的損失，而是自由世界的損失。反共的越南，一方面站在全世界反共的前哨上，正在和國際共黨的游擊隊拚命，一方面被控而立於妨礙人權蔑視自由的罪嫌地位，受到全世界和聯合國大會的審判，令人懷疑反共陣線是不是還存在的問題。

越南當前的危機不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乃至人權問題，是值得冷靜地檢討的。誠然，越南當前的危機，是由於宗教的歧視而引起的。但是，那是最初的一個階段。問題的本身，經過四個月來的演變，它已經過四度變質，變成不再是單純的佛教寺廟儀式受到政治干擾的問題。越南的佛教徒決不可能全是共產黨，也不可能全被說成是親共的。但是，反過來，越南的佛教會，乃至反政府運

動，不能說沒有受到國際共產黨的滲透、勾結和運用。

在整個越南佛教爭端中，越南政府提供的，共產黨滲透的嫌疑和罪證，是有目共睹的。譬如說，九月九日的西貢發生反政府遊行示威中，被捕的兩個女生領袖黃金安和江麗虹，便供認她們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的一份子。然而，由於越南政府在迭次處理事端的過程中有失策和欠公平之處，羣衆的感情便帶上一條盲目的路途，祇看見政府的「暴行」，沒看見共產黨的「陰謀」，祇感覺到政府的「壓迫」，沒感覺到共產黨的「嫁禍」。

九月二十日出版的時代週刊，在「出版」欄內有一篇很公正的文章，論到外國記者們對越南佛教糾紛的新聞報導，的確不免有滲入個人感情的成份。釋廣德和尚的當街自焚，奪去了「激情主義」的外國記者的三魂六魄。他們被激動得一致倒向佛教教會的宣傳。一個沒有例外。兩個禮拜前，有一個臨時被派去的美國記者，對越南的危機，有一個實際深入踏勘的機會。他排除了駐在記者的偏見，對事態和趨勢獲有一個客觀而獨立的結論。他公正地說：「領導佛教會叛亂的和尚，確實是一些十足的政客。他們倒不在乎對宗教的不公，要求政府作若何的補救，真正有興趣的是推翻吳廷琰政權」。他這個看法，遭遇外國記者招待所酒吧間的同業們一場熱嘲冷諷。他們認爲一個外來客的分析，當然錯誤得「外行」。

撥開當前的糾紛雲霧，冷靜地觀察越南的局勢，今日國際共產黨所最討厭的是吳廷琰總統的堅強領導和美、越關係的水乳交融。從正面去用功夫，是不可能達到推翻吳總統，破壞美、越關係的目的。從側面，從內部下功夫，不僅可以達到目的，而且正好利用對方自己推倒自己，自己破壞自己，一點也看不出有斧斷的痕迹。當前，越南的危機是相當嚴重的。在一條戰線上的盟友，因爲一國內政上的問題而反目，沒有比今日的美、越兩國更爲過之的。當前，兩國的武裝人員並肩在一起，兩國的情報人員也彼此面對面。但是，我們欣幸，兩國人員之間，除了政府和外交官員間反唇相譏之外，軍事人員保持極度的鎮靜和忍耐。這就因爲雙方均能認清楚大局，即是除了吳廷琰總統的領導，除了美、越兩國的團結合作，沒有第二個選擇。

據越新社發佈九月十三日吳廷琰總統接見西德電視公司記者雪佛時的談話：「越南面臨一項顛覆戰爭，如果越南是在和平之中，我將早已退休。但是，在戰時，退休將是逃避責任」。在討論到美、越關係的時候，吳廷琰總統說，最近的事件是由美國一個大報團，在一項完全謬誤的見解下，提供於美國公民之前。在其下，存在着經由國際共產掘動宣傳組織所轉播的一項麻醉運動，而此運動已重大地損害了兩國之間的關係。

另外，在此之前，當甘迺迪總統在電視上答復一項問題時，提出越南應改變政策甚至入事，以扭轉當前佛教危機的一項主張，也立刻受到吳廷琰夫人的反駁。她認爲甘迺迪總統的此項意見，乃得自一項對越南佛教危機的錯誤報導。從以上兩則談話，我們可以檢討美、越關係微妙化的內在原因。

對於國際問題的處理，政治家參考的資料，通常取決於兩途：一是公開而客觀的新聞報導和評論，一是秘密而正確的外交和政治情報。對於前者言，美國是一個堅主新聞自由、採訪自由的國家，他們認爲職業的競爭和商業的利潤，將導引一家新聞機構忠於真理，因爲讀者的批評是公正而且苛刻的。從長遠的立場看，這個信念是值得接受的。不過，從片斷的時間去看，不難發覺新聞記者的報導和輿論，有時不免失諸公平和真實的。在西貢的外國記者，是否盡到了這一神聖的責任，我們寧肯捨棄駐在國政府領袖的指摘，因爲多時以來，吳廷琰總統一家和官員便與西貢的外國記者們鬧得不愉快。我們寧願引「時代」雜誌的文章供大家客觀的批判。

「時代」雜誌說：「華府方面的欠缺真實感，不盡然是新聞使然。但是，越南的新聞報導，令人最感驚異的是，西貢記者團沒有幫助讀者看清楚那邊的混亂局面，反倒助長局面的更爲混亂化。這種失敗，應當歸咎於記者們的團結。外國記者，不論派駐在那裏，都愛成立一個非正式的俱樂部，作爲他們對國內最密切的聯繫。當他們採訪過一次新聞，或是已經從多個角度觀察過一件事物之後，總喜歡回到自己的圈子裏輕鬆一下。至於在西貢，還有比社交更重要的理由，使美國記者們結合在一起。這個國家對他們全然是陌生的。不論走到那裏，要作一次不感情用事的報導，總是困難重重。」



他們當中沒有人能操流俐的語言——和他們保持接觸的越南官員很少能說英語。可能時，他們便祇好採用當地的第二語言——法語。在整個國土上，祇有兩件新聞好寫：一場反常的戰爭，和一個反常的政府。在戰地，不管是美國的軍事觀察家或是越南的將官們，都愛慫恿地講許多新聞材料，而在記者們的眼裏，都是和事實不符的。在西貢，總統府老是緘默的、遠離的而且公然具敵意的，他們不相信西方國家的記者們，也不憚煩避免他們流露他們的任何感情。像這種不平凡的壓力驅使記者們團結至不平凡的程度。他們苦幹，各找各的門路。一旦碰頭，便交換觀念、消息、瞎說、發牢騷。本來情感的交流無礙於獨立的思考。可是，記者們却有意在他們所看到的每一件事實上，獲取一個共同的協議。由於這些協議的形成太明顯，便無法取信。於是記者們本身變為南越之混亂的一部份，對着如此複雜的情勢，他們祇從一個角度去採訪，滿以為他們自己的結論，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樣的新聞報導，自然傾向於歪曲……。

「於是，在西方國家記者團眼裏，吳廷琰總統頑固、愚蠢，受他兄弟和弟婦的控制。結果下來，記者們便採取與這三人為敵的步驟，從不放過一個機會，誇張這個家族的天主教色彩。另一方面，他們的態度，自動地對佛教徒寄以同情，伸張義憤，而佛教徒也清楚他們在這方面所居的優勢。據說，第一個和尚舉火自焚之先，佛教叛亂的領袖便早已向一個外國記者透露，當另一個女尼割腕自殺，以表示她抗議政府的鎮壓時，據說佛教徒爲了等每一個攝影記者都拍好照片，就誤四十分鐘之久，才把她送往醫院。

「時代雜誌」又說：「駐在西貢的記者對於他們的看法有着強烈的自信，凡不同於他們看法的報導，便被指爲短於思考力的觀察家的幻想。記者們當中很多對於越南軍隊在艱苦作戰中打了一次勝仗的消息，隻字不發，因爲這些消息與他們的信念相反：他們認爲西貢的佛教徒糾紛已經挫折了政府軍隊的士氣。又認爲這些消息將會減弱他們所持論證的力量；即吳廷琰在朝一日，戰敗殊屬不可避免……」

從上一段的描寫，我們看出越南佛教危機內在的一面。另一面，美國得到的政治和外交情報會不會也有同樣的情形？

### 越南剿共戰爭的政治因素

我們無法讀到美國的情報文件，便無法對這事作任何評價。但是，根據美國報紙的報導，甘迺迪總統對於五角大廈（受到中央情報局的支持）和國務院所提出解決越南危機的不同辦法，未能作一抉擇。我們據此可以推斷，美國所得到的情報是不夠充份的。在記者招待會上，記者們想盡方法企圖驅使甘迺迪總統討論涉及越南人專的問題，都被總統巧妙地躲避過。他祇是簡單地說：「凡有助於戰勝的，我們支持；凡有礙於作戰努力的，我們反對。我們決不在那裏看着戰事失利。這就是我們的政策」。

根據新聞週刊九月二十三日的報導，鑒於美國每日得花費一百五十萬元美金，用在南越的剿共戰事上，國務院仍然堅持，「除非去掉吳廷琰及其性情乖僻的妻子，戰事無法取得勝利」。國務院此一觀點，當新任大使洛奇晉謁吳廷琰總統作爲時九十分鐘的談話的時候，曾明白而溫和的表達出來。吳總統聽後當時冷然未作一答；事後，他曾借題表示過他的「忿怒」。某些國務院的人士還相信，甚至吳廷琰本人也必須離去。他們的理由：「美國與此一政權爲盟，勢將把她在亞洲國家中的威望，盡付流水」。

與此相反的，許多五角大廈的官員堅持無需作一次更易，軍事家的意見，認爲任何改組越南政府的企圖，事實上將會使得剿共戰爭遭逢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國防部已經成熟了的一個計劃，預備在本年聖誕節前撤回一千人。他們還害怕任何對吳廷琰政權的干預，會立刻招致軍隊補給線的抵制，這些補給線是掌握在效忠於政府的文官手中的。負責軍援的美國駐越南軍隊總司令哈金斯上將特別在九月二十日告訴合衆社的記者，他相信越南政府贏得剿共戰爭全面勝利的日子，在不久的將來，終會實現。可見擺脫政治去看越南的前途，不論在華府，抑在西貢，都是一致樂觀的。不過，越南的剿共戰爭，確是賭國力、賭耐力的戰爭。投付下去的除了傳統性戰爭所需的經濟力、軍事力之外，必須加上政治力這一不可或缺的因素，這是亞洲戰場的特色，也是剿共戰爭的特色。

從上交的分析，看出當前越南危機的癥結所在是政治。解救此一危機，端賴有卓識、遠見和毅力的政治家。這些努力，一半靠西貢，另一半靠華盛頓。

# 透視日匪貿易

日本當局昧於近利，耽於安樂，妄圖在匪俄衝突匪陷於孤立無援時，資匪以檢取便宜，實在短視而且自害害人的作法，日本人士，應該反省。

## 一 初期日匪貿易的演變

共匪竊據大陸後不久，日匪雙方，已開始貿易的醞釀，至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共匪將食鹽八千噸售與日本，迨該年十月共匪偽政權成立，日匪貿易，遂開始活躍。當時日本在盟軍管制下，故該年日匪貿易，日本輸出為三百十四萬美元，輸入為二千一百七十六萬美元。翌年則大見增加，輸出達一千九百六十萬美元，輸入為三千九百六十四萬美元。該年六月，韓戰爆發，盟軍當局於十二月六日起，對日貨輸往匪區，採取了全面限制措施，使匪日貿易，陷於完全停頓狀態。在韓戰第一年中，日本受軍事特需之刺激，經濟漸趨繁榮，但若干中小企業，仍不忘與共匪貿易。在共匪方面，雖於一九五一年一月，透過匪「進出口公司」向日本申請訂購大批有關製造肥料、精油、製麵粉、製鋼、電纜、電線等各種工廠設備，但由於盟軍的限制，并無進展。故一九五一年日匪間貿易，僅能經過香港作若干交易，但該年貿易額，日本輸出仍有五百八十三萬美元，輸入為二千一百六十一萬美元。

一九五一年十月，蘇俄在莫斯科召開民間實業家之「國際經濟會議」，圖謀促進東西間經濟交流，日本及共匪均被邀參加，因日本政府未允正式派代表出席，結果由高良富、宮腰喜助、帆足計三氏，以私人資格前往。高良等三議員在會議結束後回國途中，接受

朱少先

朱少先

共匪邀請，訪問匪區。高良等訪問大陸，不但為戰後日本人訪匪之首次，且於該（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與匪「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簽訂一項輸出入各三千萬英鎊的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協定有效期，原為七個月，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後因實施成績不佳，曾將協定延長至翌（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但直至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民間貿易協定成立，雙方貿易總額，為三百零三萬英鎊，僅達成協定總額百分之五。其實施實績所以如此低落原因，係由於匪日雙方無統一之貿易機構，由日本各民間商社代表，經香港進入大陸，在協定範圍內，個別與共匪進行所致。至一九五二年底，僅成立十個契約，貿易總額不過二百二十萬零九千七百四十三英鎊，商品亦極有限，其最初十個契約如第一表：

第一表 日匪民間最初十個契約（單位英鎊）

契約次序	商廠名稱	品名	輸出入	金額
一	巴商事	自行車、海帶、人造絲	出	一八九、九三
二	東京貿易商會	海帶、打字機	出	三、四六
三	旭絲廠	人造絲	出	四六五
四	啓明交易海帶	海帶	出	一、〇一
		大豆、黏土	入	一八九、〇〇
		大豆	入	三、四六
		麥麩	入	四六三
		蠶絲	入	一、〇〇〇

五	啓明交易紡織機、馬口鐵板	三九、九六七	開灤煤	三九、九六七
六	東邦商會人造絲	共、三〇〇	大豆	共、三〇〇
七	啓明交易鐵絲、鐵板	四〇、〇〇〇	開灤煤	四〇、〇〇〇
八	羽駕商店人造絲	九、二五〇	柞蠶絲	九、二五〇
九	極東物產香料	三〇、〇〇〇	苜蓿	三〇、〇〇〇
十	共榮商事洋菜	一、四五六	大豆	一、四五六

而且在日本政府方面，對此類商社，亦不給予任何保障。到一九五二年末，日方圖打開日匪貿易，成立了「日匪貿易促進議員聯盟」，並在各地地方設立支部，翌年四月地方選舉中，促進日匪貿易，成爲各黨競選口號，同年七月韓戰停戰後第三日（七月二十九日）在日本衆參兩院，通過了促進日匪貿易決議，一面由國會議員與實業界代表合組視察團訪問匪區，商談第二次日匪貿易協定，至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北平正式簽字。該次協定與第一次協定，原則並無多大變更，貿易總額仍爲六千萬英鎊，在簽約當日，日方代表與共匪各貿易公司，立刻成立了輸出四百零八萬九千三百五十英鎊，輸入三百萬零九千零九英鎊契約，貿易品目，亦有增加，但實施成績不佳。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各都、府、縣代表在東京召開全國性國民會議，要求政府承認該項協定，並促進該協定的完全實施。翌年一月在新瀋市舉行「對岸貿易振興港灣復興會議」，四月在札幌市舉行「日匪日蘇貿易促進北海道大會」，六月在東京舉行全國市長會議中，又通過了促進日匪貿易的決議。八月在函館市又舉行「日匪日蘇經濟交流促進大會」，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議會，均有促進日匪日蘇貿易之決議案，在全國普遍展開了促進日匪貿易爲中心的國民運動。但日匪貿易，由於（一）受對「中共」禁運措施之限制；（二）對非禁運物資受美、韓、中各國壓力之影響；（三）鍊鋼業未曾參與及（四）付款問題未獲解決等原因，故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協定終了止，貿易額不過二千三百二十八英鎊，僅達貿易總額六千萬英鎊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在同一年中，國際上四國外長會議在柏林集會，商討擴大東西貿易問題，在日內瓦又舉行第二次東西貿易會議，加以越南停戰，和平共存空氣非常濃厚。在共匪方面，正進入第一次五年計劃經濟建設期，需要大量資材。在日本國內，鳩山內閣成立，石橋湛山出任通商產業大臣，而兩人均主張促進對匪俄貿易。日本經濟團體聯盟、關西財界、學者及其他貿易團體，決定合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該會任務，除了促進日匪貿易外，更發展爲日匪復交運動，該年十月，「日本國會議員訪問團」，第二次訪問匪區，曾與周匪恩來及雷匪任民（僑貿易部副部長）會談，當時匪方表示，爲擴大日匪貿易及解決貿易上一切問題，雙方應互派代表團長駐各該國，至於第三次貿易協定，共匪同意在年內派代表至東京商談。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共匪始派「貿易代表團」（雷匪任民爲團長）訪日，五月四日並在東京簽訂第三次日匪貿易協定。協定內容，除有效期間一年，貿易總額仍爲六千萬英鎊外，關於付款及結賬事宜，委託匪「人民銀行」與日本銀行簽訂支付協定辦理，在支付協定未簽訂前，仍暫以英鎊現金支付，同時規定雙方得在兩國首都設立商務代表機構，並享有外交官特權。日本政府對此項協定，以日匪尙無外交關係，未同意批准。祇允許匪方在日本設立民間貿易機構，不得享受外交特權，貿易機構人員在日本停留兩個月以上時，須遵照日本法律按印指紋。鳩山內閣採取此項措施，關係受美國壓力所致。該年秋，日本實業訪問團第一次訪問匪區，共匪在東京、大阪復舉行商品展覽會，故一九五五年雙方貿易額，較一九五四年大見增加，但至一九五六年五月協定終了，僅完成貿易協定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五，即三千三百八十萬英鎊。協定期間終了後，因匪方不滿日本政府態度，故意延宕第四次貿易協定之商談，最後不得不將原協定延長一年。在此期間，日本第二次實業訪問團，再度訪問匪區，並簽訂了農藥、農具、纖維工廠設備、水泥等契約，截至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期滿，雙方貿易額達六千零二萬英鎊，故第三次日匪協定，兩年實施結果，總額達九千三百八十三萬英鎊，佔貿易總額百分之一百五十六點三十九，貿易額有顯著增加，因此更提高了日本對匪貿易興趣，不斷要求政府擴大對匪貿易及改善對匪方人員

待遇。當時岸信介政府決定了五項對匪談判第四次日匪貿易協定之原則爲：(一)雙方輸出入額仍各爲三千萬英鎊；(二)允准共匪在日本設立民間貿易機構，但免按印指紋者不得超過五人；(三)除關稅外不給與外交官待遇；(四)允准使用密碼，免征營業稅及所得稅等，停止行使警察權，不必按照外國人登陸法登記；(五)付款與結賬辦法，由「人民銀行」與日本東京銀行辦理，但東京銀行必須獲得日本銀行之保證。日本貿易代表團根據日本政府決定之原則，由池田正之輔率領赴北平談判，自九月十八日開始至十一月一日，先後會談四十五天，但因共匪拒絕日本政府談判原則，談判毫無結果，貿易代表團亦即返國，從該時開始至一九五八年初，日匪雙方在無協定狀況中進行零星貿易，其貿易額大見減少。但至一九五八年二月，日本鋼鐵業代表團訪問匪區，與共匪簽訂了一項「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鋼鐵易貨協定」及「一九五八年度易貨議定書」，雙方同意在五年內由日方供給各種鋼材，匪方供給鐵砂和煤，貿易總額爲二億英鎊。日本產業界受此刺激，再度由「日本國會議員日中貿易促進聯盟」、「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等團體訪問，並於三月五日在北平簽訂第四次「日匪貿易協定」，該協定期間仍爲一年，貿易額各增至三千五百萬英鎊，雙方同意在對方國設置民間貿易代表機構。在備忘錄中，規定貿易機構人員不按印指紋並有權在建築物內懸掛國旗。

當時岸信介政府對此項協定，未允給予任何保證。並於同年四月九日間簽約雙方提出書面意見如下：

(一)日本政府認爲「日匪第四次貿易協定」係以互不干涉內政及互相遵守對方國內法令爲原則；根據雙方經濟要求，從事擴大雙方貿易而簽訂；

(二)該項協定係民間協定，非政府間協定，但日本政府尊重擴大雙方貿易之精神；

(三)日本政府無意承認「中共」政權及匪貿易代表具有外交特權；

(四)日本政府認爲貿易代表機構，無權懸掛「中共」僞國旗

共匪對岸政府復文，認爲日本政府已完全否定了「第四次日匪貿易協定」，匪方以「中國貿易促進會」主席南匪漢宸名義，發表聲明，拒絕日本之覆文。適在此時(五月二日)在長崎市舉辦的匪「郵票和剪紙展覽會」會場所懸之僞旗爲一名日人所扯下，五月十日陳匪毅僞外長遂發表正式談話，宣佈與日本全面斷絕貿易往來。故自一九五八年五月之後，日匪貿易已完全斷絕。

## 二 「友好交易」期間的日匪貿易

日匪貿易中斷之後，該年八月，社會黨議員佐多忠隆等訪問匪區，試圖恢復貿易，當時周匪恩來曾提出了所謂：「(一)不敵視共匪；(二)不從事製造「兩個中國」；(三)不妨害匪日貿易關係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則，周匪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接受上項原則，日匪貿易無法恢復。但實際上，自日匪貿易停止後，共匪失去了在日本政治滲透機會，不過在此期間，日匪雙方仍不斷透過香港進行貿易，至日本發生反對日美安保新約鬥爭中，共匪曾給予有力支持與協助，日匪之間，又開始了新的關係。該年八月「日匪貿易促進協會」理事長鈴木一雄訪問匪區，與周匪恩來會談，周匪會表示，共匪願意在「政治三原則」基礎上，發展對日貿易，並提出了：

(一)政府間協定；(二)民間協定；(三)個別照顧。」等所謂對日貿易之原則。周匪認爲過去之「民間協定」，因從未獲得日本政府保障，故今後所有一切協定，除非由雙方政府締結，否則貿易即無法全面展開。不過若干民間企業，根據雙方需要，亦可締結貿易契約，但此項從事對匪貿易之民間商社，必須具備：「不敵視共匪，不製造兩個中國及能爲共匪信任確能努力從事與共匪友好發展與國交正常化」之「友好商社」條件，否則共匪將不與之往來。此種「友好交易」，在性質上已非單純的「民間貿易」，而必須附帶了政治考慮在內，故與日匪貿易中斷前，本質上已大不相同。此種「友好商社」貿易方式，自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開始，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止，共匪所認可的所謂「友好商社」，已增至一百八十二家，其中包括了銀行、海運、保險業在內，除若干大企業外，中斷前

與共匪有往返之商社，幾乎已全部參加。所謂「個別照顧」，已自一九五九年開始，此次交易，係由於日本中小企業需要若干共匪特產品，經由社會黨及總評交涉決定，並隨時受到親共團體個別照顧。此類「友好交易」實施後，雖然貿易額增加不多，但却以新姿態，重行開始了日匪貿易。尤其是一九六一年以後，「友好商社」數量增加，交易品目，亦逐漸擴大，共匪每年四月十五日起在廣州舉行的「中國輸出品春季交易會」，又邀請日本友好商社參加，在會期中即簽訂了若干輸出入契約。同年秋季交易會中，也同樣簽訂了輸入大豆十五萬噸及輸出尿素十萬噸之契約。故一九六一年日匪貿易額，輸出一千六百六十七萬美元，輸入三千零八十九萬美元，合計四千七百六十萬美元，較一九六〇年二千三百四十五萬美元，增加一倍。一九六二年一月至六月日匪「友好交易」實績，輸出二千四百八十八萬美元，輸入二千三百九十八萬美元，總計四千八百八十五萬美元，半年之間，已與一九六一年全年相等。

### 三 現階段之日匪貿易

日本池田政府於一九六〇年年底，決定實施一項自一九六一年起至一九七〇年止的「十年內國民所得倍增」的長期經濟計劃，包括擴大對共產集團貿易，一九六二年五月日本更表示願考慮接受延期付款辦法以試探擴大對匪貿易，同年八月池田接見前首相石橋湛山時，亦表示對共匪貿易問題有積極推動之意。共匪立即乘機由周匪恩來出面，邀請自由民主黨議員松村謙三及前通商大臣高崎達之助訪問匪區，商談貿易問題。松村謙三遂於九月十七日先行到大陸作初步商談，松村返日後，立即着手籌組經濟訪問團，由高崎達之助率領，代表團員中，包括鋼鐵、肥料、農業、農業機械、生產設備等各業代表。日本政府於十月十六日閣議後，由大平外相、福田通產相、田中藏相、宮澤經濟企劃廳長官又舉行一次經濟關係會議，討論高崎達之助訪問匪時日本政府對匪貿易三項基本方針。

(一) 由民間簽訂的貿易協定，期間限為五年，在此期間內謀取貿易的均衡。

(二) 延期付款期限以歐洲為標準，但機械類、氯化氫等採取彈性政策，延期付款品目為機械類、鋼材、氯化氫、尿素等，疏安不包括在內。

(三) 實施貿易協定的聯絡機構，視共匪態度如何再行決定。高崎達之助到達匪區後，自十月二十九日起，與廖匪承志舉行會談，至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簽訂了一項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五年的「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附件(一))每年平均往返貿易總額，希望能達到三千六百萬英鎊。此一貿易備忘錄，雖然貿易數額不大，但在本質上已有重大改變：

(一) 此次日匪貿易協定，採取了「備忘錄」形式，其目的無非是想遮掩世人耳目，避免刺激自由國家及日本國內反共人士，並使協定更富彈性。

(二) 關於付款方式除開信用狀外，還決定了日本輸往匪區的部份商品及工廠設備可採取延期付款辦法。

(三) 在備忘錄日匪雙方交易品目中，特別規定了由日本輸往匪區整套工廠設備。

(四) 在備忘錄簽字的，日本方面是前通產大臣高崎，共匪方面是現任「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較過去由匪方主管對外貿易的南匪漢宸相比較，顯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日匪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日本國際貿易協會」副會長宿谷榮一及該協會關西本部專務理事木村一三與南匪漢宸相，又簽訂了一份「日匪貿易議定書」(附件二)規定了擴大貿易，交換舉辦商展及促進人事技術交流等具體步驟。上項日匪貿易備忘錄與議定書簽訂之後，日匪貿易，可謂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內閣決定批准倉敷纖維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共匪輸出價值二千萬美元的合成尼龍整套工廠設備，而且是由日本政府正式核准了「分期付款」的辦法，并由日本政府銀行擔保，等於變相的經援共匪。池田政府這個決定，不只是核准一筆交易問題，而是表示日本政府不顧自由世界的共同利益，公然破壞對

匪禁運政策，當然也是對我國極不友好的行為，我國提出了嚴重的抗議。日本政府事後雖曾向我有所解釋，如稱：

- (一) 日本政府對匪貿易，仍堅持政治與經濟分開的原則。
- (二) 整套設備出口，是日本輸出振興政策的一環，不是經濟援助。
- (三) 對共匪分期付款辦法，不比對其他自由國家條件為優厚。
- (四) 今後日本對共產國家分期付款信用資金，仍沒有一定限額，現在的比例是自由國家佔百分之九〇，共產國家佔百分之十，今後仍將保持此一比率等。自然不能為我所接受。

#### 四 日匪貿易實績

日本對大陸的貿易，在戰前佔了相當比重，但戰後一落千丈，尤其是共匪竊據大陸之後，貿易額更微不足道。根據日本大藏省所發表的資料，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日匪貿易的通關實績如第二表：

第二表 日匪貿易通關實績(單位千美元)

年 度	輸 出	輸 入	總 計
一九四九	三、一四四	二一、七五六	二四、九〇〇
一九五〇	一九、六三二	三九、六三六	五九、二六八
一九五一	五、八二八	二一、六〇六	二七、四三四
一九五二	五九九	一四、九〇三	一五、五〇二
一九五三	四、五三九	二九、七〇〇	三四、二三九
一九五四	一九、〇九七	四〇、七七〇	五九、八六七
一九五五	二八、二三二	八〇、七五五	一〇八、九八七
一九五六	六七、三四四	八三、八七三	一五一、二一七
一九五七	六〇、四八五	八〇、四八二	一四〇、九六七
一九五八	五一、一一三	五四、四二三	一〇五、五三六
一九五九	三、六四三	一八、九一七	二二、五六〇
一九六〇	二、七二四	二〇、七二九	二三、四五三

一九六一	一六、六七三	三〇、八八五	四七、五五八
一九六二	三八、四五七	四六、〇二〇	八四、四七七

從上表統計，可以看出，日匪間貿易，在共匪成立初期，為數極少，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因受禁運限制，其數額亦極端有限，但一九五三年韓戰停戰，又值共匪進入所謂工業「大躍進」時期，雙方貿易額遂逐年增加，到一九五六年已增至一億五千餘萬美元，但一九五八年共匪因日本政府不承認第四次日匪民間貿易協定及長崎撕毀偽旗事件後，日匪貿易，幾陷於停頓，雙方貿易額亦降至二千餘萬美元。在此值得注意的，當日匪貿易鼎盛時期，亦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左翼政團要求恢復日匪邦交最激烈時期，例如一九五七年七月，在東京成立了「促進日匪復交國民會議」，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東京舉行「要求日匪復交大會」，到達要求「日匪復交」運動高潮，事後證明，其皆為共匪所策動，也說明了共匪以貿易為餌，以達到其政治滲透目的。要不是在一九五八年共匪宣佈與日本斷絕貿易關係，一九六〇年的日本安保騷動，勢將更不可收拾，共匪為補救錯誤，在一九六〇年提出所謂「貿易三原則」，以便藉貿易恢復其政治滲透工作。

其次，再就日匪雙方輸出入額比較，日本對共匪貿易，除一九六二年至六月稍有出超外，其餘均屬入超，就日本言，日匪貿易，對日本並非有利，而且這些貿易差額，有一部份流入日共及左翼團體手中，作為赤化日本之資金。

再就日匪貿易中雙方輸出入商品成份加以研究，如第三四兩表所列如下：

第三表 日本對匪最近七年間輸出商品成份(%)

項 目	一九五七	一九五七	一九五八	一九五九	一九六〇	一九六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至六月
鋼 材	四·五	二〇·三	三〇·七	一·七	二·五	四三·三	二五·五
化 學 肥 料	二二·〇	三三·〇	三三·二	—	二二·一	一〇·一	—
農 藥	四·五	一·六	一·九	—	一·八	〇·四	—



鼓勵作用。

(二) 去年池田及大平分別訪歐，今春英、法外長亦赴日報聘，在會談中，獲悉英、法積極對匪展開貿易之企圖，且在同年八月，英國三家化學公司，又在北平舉辦工展，九月又將有英、法兩國經濟代表團訪匪，展開貿易活動，日本亦圖搶先一步。

(三) 匪俄莫斯科會談失敗後，其對立關係更趨尖銳，共匪經濟援助來源斷絕，經濟已陷於困境，日本不思根絕侵略禍源，竟誤認共匪為其擴展貿易的絕好機會，重溫過去對大陸貿易之舊夢。

(四) 自美國甘迺迪總統向國會提出咨文，要求國會同意實施平衡稅後，對日本國際收支影響甚大，當時日本曾派大平飛美與美國交涉，要求援加拿大例予以優待，但美國未予同意，而且美國對日本棉織品等限制輸入，對日本影響亦大，雖經交涉，亦無結果，日本遂以擴展對匪貿易，向美敲榨。

(五) 日本國會預定在本年內解散，重行選舉，池田企圖在對匪貿易政策上表示前進姿態，爭取中小企業選票，并獲得若干政治資本。這些都是池田的如意算盤。

至於共匪方面，其對日基本政策為離間日美關係，達到中立日本，進而赤化日本，對日本貿易，其政治目的重於經濟目的。美國哈里曼副國務卿在日美協會上，曾公開表示：「與任何共產國家從事貿易，都會被利用以達成其政治目的」。這是一針見血之言。共匪對日貿易表示積極態度，亦有下列原因：(一) 過去事實證明，共匪利用對日貿易，實施政治滲透，但因一九五八年共匪自動宣佈與日本斷絕貿易後，未能在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中發生積極作用，因此周匪恩來又在該年提出所謂「貿易三原則」，以圖挽回。去年石橋、松村訪匪時，周匪恩來親自主持指揮貿易談判，一遇困難，立時解決，故日匪間五年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得迅速完成。且處處遷就日本，俾可以貿易為餌，恢復並擴大其政治滲透。

(二) 匪俄交惡後，共匪在經濟上陷於困境，必須爭取外援，在地理位置上，日本實為爭取之主要對象；故對日本貿易，表示積極態度。而且共匪在外交上陷於孤立，必須爭取各國支持，日本當然又是主要目標。

綜上所述，可知日本當局目前昧於近利，耽於安樂，妄圖在匪俄衝突匪陷孤立無援時，資匪以檢取便宜，實在是短視而且自害害人的作法，日本人士，應該反省。

## 附件(一)

### 日匪貿易「備忘錄」

① 廖(匪)承志與高碕達之助，基於本年九月周(匪)恩來(總理)與松村謙三氏之間所舉行關於擴大「中」日貿易會議之宗旨，在平等互惠之基礎上採取漸進的累積方式，為更進一層發展雙方之間貿易，特交換備忘錄如下：

② 雙方一致同意發展長期綜合易貨貿易，以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為第一次五年貿易期間，希望每年平均往返貿易總額能達到三千六百萬英鎊。

③ 雙方之主要輸出品如下：

「中共」方面：煤、鐵砂、大豆、玉蜀黍、豆類、鹽、錫及其他。

日本方面：鋼材(包括特殊鋼)、化學肥料、農藥、農業機械、農具、整廠設備及其他。

④ 根據備忘錄之有關交易事項，由日方當事者與「中共」對外貿易進出口公司分別簽訂契約。

⑤ 根據本備忘錄之有關交易事項，以英鎊或以雙方同意之貨幣開設信用狀，或以保證狀方式予以保證結算。

⑥ 雙方一致同意日本輸往「中共」商品中一部份商品之延期付款方法，及另行協調整廠設備之延期付款方法。

⑦ 雙方一致同意為實施本備忘錄，應促進必要之技術交流與合作。

⑧ 商品檢查、仲裁、以及為實施本備忘錄之其他必要事項，由雙方另行協議規定之。



⑦本備忘錄以及基於本備忘錄所締結之協定與契約，如非經雙方當事者之同意不得廢除。

⑧本備忘錄以及基於本備忘錄所締結之協定，經雙方同意得以修正與調整。

⑨本備忘錄，自簽訂日起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有效期間，經雙方同意得以延長之。

⑩本備忘錄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簽署，計中日文各兩份，雙方均有同等效用。

「中共」代表 廖（匪）承志  
日本代表 高崎達之助

## 附件（二）

### 日匪貿易「議定書」

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日本國際貿易協會副會長宿谷榮一，及同協會關西本部事務理事木村一三，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南（匪）漢宸之邀，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友好訪問為目的訪問「中國」。雙方舉行友好的會談，就強化「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的會談，就強化「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貿易問題，意見完全一致，經協議如下：

①雙方自「中國」總理周（匪）恩來提示「中」日貿易三原則以來「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貿易在兩國人民積極支持下，經過雙方共同努力，已有莫大之發展，一致認為在促進「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關係上已有重大貢獻。「中國」方面對於日本各有關團體以及熱心於「中」日貿易人民，為擴大「中」日貿易，在困難條件之下繼續不斷的鬥爭，深表敬意，日本方面對於「中國」方面之合作，深表感謝之意。雙方再度聲明支持「中國」政府為「中」日關係所提示之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以及政經不可分之原則。並表明以堅守此等原則為基礎強化「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關

係，及繼續努力於兩國關係之正常化，「中」日貿易之發展，對於兩國人民均有利益，正當「中」日貿易呈現新發展之際，美帝國主義加以公然干涉妨礙，雙方對此除表示憤怒外；並表示反對到底。雙方相信發展「中」日貿易為兩國人民之共同願望，任何力量不能阻止。雙方相信「中」日兩國人民間之友好貿易，在今後亦為「中」日民間貿易之重要方式之一，在既有之良好基礎上具有明朗的發展前途。雙方繼續不斷採取各種積極措施以使「中」日兩國人民之友好貿易關係，更形強化。

②雙方一致同意相互在對方單獨舉行商展。日本方面之商展於一九六三年內在東京、大阪舉辦。「中國」方面之商展於一九六四年內在東京、大阪舉辦。

③為促進「中」日兩國人民間經濟貿易關係與友好關係之發展，雙方同意邀請經濟貿易界人士及有關團體互相訪問。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及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邀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於一九六三年內派遣代表團赴日本作友好訪問，「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對此邀請已予接受。

④雙方同意努力促進「中」日兩國間之技術交流。

⑤雙方同意為促進貿易進行上之便利，加強兩國銀行間之聯絡，由兩國銀行間直接開設信託狀。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在北平簽字）

「中」日貿易議定書附屬備忘錄

①「中」日雙方同意互相舉辦商展之具體事項如下：

②雙方希望商展之展品，以足以反映其本國農業與工業發展最高水準之展品展出。

③展出者方面在商展終了後，希望將展品在現地出售時，對方應介紹予其本國之商社。

④雙方各自在舉辦商展期間，得出售本國之即賣品。

⑤雙方得將出售展品及即賣品所得價款充用舉辦商展之經費。

⑥雙方得於舉辦商展期間邀雙方之考察團參觀訪問。

⑦本附屬備忘錄為議定書不可分之一部份。

# 匪俄在新疆的尖銳衝突

朱文琳

## 壹 匪俄承認在新疆衝突劇烈

九月六日，匪「人民日報」及「紅旗」雜誌會同時刊出一篇文章，題為「蘇俄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指控蘇俄駐新疆的機構和人員，在新疆伊犁進行大規模的顛覆活動。例如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間，曾引誘和脅迫幾萬中國人民跑到俄國。對此，匪偽政權再三提出抗議和交涉，要求蘇俄遣返這批中國人，可是蘇俄政府却以「蘇維埃法制」和「人道主義」為藉口，拒絕了共匪的要求。這件事情直到現在還未解決。

對共匪的此項指責，蘇俄官方未正面解釋，僅由「共青團真理報」（俄共青年團機關報）刊載了一篇新疆逃俄難民訪問記，作為答覆這篇訪問記中，承認有大批新疆回教人民於今春逃入俄境，并說類似的逃亡情形仍在繼續中。至於逃亡原因，是為飢餓所迫和無法忍受共匪的暴政迫害，因為他們大都是俄國籍或同情俄國者。據一位由伊犁逃出的科德齊夫說，在他逃亡之前，曾目睹伊犁區的共產黨員及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四百人，因涉嫌親俄而被捕。

以上是匪俄首次公開承認雙方在新疆發生不可調和的衝突。它雖未描出衝突的全貌，但有力地表現出雙方關係的惡化已到十分嚴重程度。

俄帝侵略中國，新疆是首要目標，因此在歷史上是中俄衝突最烈的地方，而以伊犁為主要「戰場」。今天匪俄既在此等地區發生尖銳化的衝突，難怪敏感的西方人士會發生疑問，它會不會觸發兩國的歷史仇恨，擴大分裂，演成民族戰爭。對於此種繁雜問題，本

文不擬作出具體結論，只想引用已知之各種有關線索、消息和資料，就匪俄在新疆發生衝突之經過及其可能發展，勾畫出一幅比較明晰的輪廓，供研究匪俄關係問題者參考。

## 貳 發生衝突的歷史根源

俄人與新疆發生關係，始於十六世紀中葉，而以一六二八年土爾扈特蒙古由新徙俄屬額濟勒河，首開新疆中俄交涉之紀錄。到十七世紀後半葉，俄皇大彼得銳意經營中央亞細亞，使俄商經巴爾塔什湖東入伊犁，俄國的勢力亦隨之進入新疆，於是擄財掠土，蠶食鯨吞，相繼二百餘年，積成一段可恥可悲的歷史。

關於俄人侵略新疆的歷史，事實俱在，著於史書，此處毋庸贅述。但為研究之便利，必須說明左列四點，因為這四點或與匪俄發生衝突有因果關係；或對瞭解目前的匪俄衝突有參考價值。

一、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到民國三十一年，蘇俄利用新疆督辦盛世才，赤化新疆，企達囊括之目的。在此期間俄人除派兵鎮守，獨佔經濟，并派俄人為顧問，監督全疆行政外，還先後利用馬虎山、窩士曼等人在南北疆製造叛亂，作為對盛的牽制。

二、民國二十三年七月，盛世才不甘俄人脅迫，乘德蘇戰爭緊張，俄人無力東顧之際，斷然上書中央，決心「叛黨反蘇」，輸誠祖國。於是我國家之力量，重伸於西疆。俄人見狡計未逞，功虧一簣，從新疆撤退時，除將新蘇合營之工廠拆遷、破壞外，並在伊犁製造叛亂，派遣俄兵支持叛徒，於是天山南北烽火遍地，以「東土耳其斯坦」民族革命為口號，以歸附蘇俄為目標之叛亂組織與武裝

於焉形成。

三、由於我新疆各民族人民愛國團結，支持政府；衛國將士誓死用命，浴血苦戰，使暴亂陰謀終未獲逞。蘇俄乃轉充「調人」，在三區暴亂份子參加新疆地方政府之條件下暫息戰火，使新疆獲得表面之統一。但叛軍仍割據三區（伊、塔、阿），叛黨則利用參加聯合政府，實施地方選舉的機會，陰謀奪取政權。此項陰謀終因我防範得法，未成事實。但蘇俄運用伊犁反動份子及外蒙軍隊，煽動吐、鄯、托及喀什暴亂，製造蘇僑越界事件和北塔山邊界戰爭，企圖以武裝暴亂壓迫國軍退出新疆。

四、三十八年，當大陸剿匪戰事失利，國軍準備轉進關內之時，蘇俄駐新總領事巴米諾夫和俄共新疆支部書記奧古林等透過新疆省政府向我提出簽訂貿易及經濟合作協定之要求，在蘭州被圍，新疆孤懸之際，又提雙方以伊犁反動集團、駐新國軍、地方開明人士重建聯合政府的建議，其原因在不願放棄新疆之領土與權益，欲使新疆變成以蘇俄為核心的附庸政權。

### 叁 矛盾、衝突及其發展概況

前面說過，在共匪入新之前，蘇聯擬在新疆建立以蘇俄為核心的附庸政權，簡言之，蘇俄雅不願匪軍進入新疆。此點，除由俄方逕與匪方商談外，并授意陶逆峙岳，會彭匪德懷於安西，以新疆駐軍太多，人民無力供應為理由，勸阻匪軍暫勿入新。共匪當時未接受俄方與陶逆之意見，終於三十八年九月進軍新疆。斯為共匪與蘇俄矛盾之所在與衝突的根源。

共匪入新後與蘇俄的關係，約略可分為三個階段：

#### 第一階段

一、第一階段——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忍讓：匪軍雖入新疆，政令仍未統一，非僅伊、塔、阿三區形成割據局面，即南疆喀什之政令入事與迪化省偽府亦貌合神離。凡此均受俄方所主使。當時匪偽政權既持「一面倒政策」，固不願開罪俄國；而蘇俄為顧及共同利益，自亦不願太使共匪難堪。於是雙方讓步，獲得暫時妥協，在共

匪俄在新疆的尖銳衝突

匪一方面採取如左之措施：

- (一)組織以伊犁叛亂份子為主體的「人民政府」，并使俄籍人員，間諜參加政府，且身居要津。發生主導作用。
- (二)將新疆之經濟權益，拱手送給蘇俄，除與蘇俄簽訂為期三十年的三項協定外(○中蘇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協定；○中蘇石油公司協定；○有色及稀有金屬協定。)并使蘇俄獨佔對新之貿易。
- (三)一切文化教育工作，在「國際主義」的原則下，以蘇俄為模範。
- (四)籌備并逐步實施區域自治，以俄帝培植之傀儡份子賽福鼎任主席。

與共匪讓步的同時，蘇俄亦採取相應的措施：  
(一)三區放棄特殊化，除簽訂「愛國公約」支持共匪的政策接受其領導外，還將「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陣線之偽裝組織)擴大改編成「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作為共匪的統戰組織。

(二)統一黨團組織：將新疆原有之共黨組織歸併於中共組織，由中共統一領導。

(四)將三區叛軍統一改編為偽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納入匪軍序列。

上述匪俄雙方的互相讓步，使匪俄在新疆的權力鬥爭獲得平衡，相互間的矛盾獲得統一，而維持了將近二年的無間合作。等到韓戰過後，由於共匪在國際間影響力增加，更由於史達林死後，蘇俄國內政治不安，使匪黨在共產集團中發言權提高，而迫使蘇俄不得不收縮其在新疆的非法權力。(一)於民國四十四年元月起放棄匪俄在新疆合組三大公司的股權；(二)俄國幹部和間諜退出新疆政治舞台；(三)一些仗仗蘇俄勢力、橫行不法之官吏和土劣准由共匪加以整肅；(四)蘇俄同意與共匪合力共建中蘇友誼鐵路。這樣一來，匪俄之間新生的矛盾又獲克服，雙方的關係仍然和諧。

#### 第二階段

二、第二階段——叛跡顯著共匪無情整肅：民國四十四年十月

偽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後，以伊犁反動份子爲主的匪僞幹部，利用區域自治爲憑藉，展開分裂活動。直到目前我們還沒有直接佐證，證明此次活動爲蘇俄所領導；不過左列的事實，使人無法相信它與蘇俄沒有關連：

(一)運動目標：要求脫離中國，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或「維吾爾斯坦共和國」。

(二)行動路線：○反對中國共產黨之領導，要求成立地方民族的共產黨。○反對匪軍和生產建設兵團，要求成立「民族軍」。○反對漢人，採取孤立封鎖與不合作運動，要驅逐漢人滾出新疆。○反對在新疆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實施暴動，在南疆的巴楚、英吉沙、莎車一帶會連續發生暴動。○在文化教育上實施反漢親俄教育。

(三)領導方面：此項分裂活動，由蘇俄一手培植之伊犁派份子爲中堅，并以伊犁阿三區爲基地，而擴及於全疆。其主要領導人爲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長賈合達，副州長阿不都熱衣木·艾沙，自治州委會宣傳部副部長阿合買提哈里，比同巴耶夫，僞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長夏衣馬爾且等。

共匪對此種分離主義的活動，自然不能容忍，尤其當一九五六年俄共二十大會以後，匪俄關係發生間隙之後，更不能允許此種顛覆行動之發展，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部署後，共匪於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起，展開對分離主義者的整肅。共匪採取之措施如次：

(一)暴力鎮壓：逮捕分離活動之首要份子，按情節及反省情況予以不同處分。對中下級人員，採取殘酷之殺戮政策。僅喀什一地屠殺約四千人。

(二)公開駁斥：指斥分離主義運動由帝國主義所策動，其領導人和帝國主義有勾結。還說「東土耳其斯坦」是帝國主義者製造的名詞，旨在爲其侵略開路。這種指斥，無異指看和尚罵禿驢，任何人都聽得出它是在罵蘇俄是帝國主義。

(三)改革文教：○廢棄新疆各學校的教材，因其是從俄文翻譯而來；○廢棄以俄文字母拼音的維、哈等民族新文字方案，以「漢

音方案」爲基礎，重新改革新疆民族文字。

(四)改變態度：○在政治教育方面，放棄國際主義教育的字樣，改用「愛國主義」教育與「社會主義教育」。○在新疆各種集會講演與宣傳刊物上，不再看到歌頌蘇俄、感謝蘇俄及鼓勵學習蘇俄先進經驗一類肉麻的話，甚至連蘇聯一詞亦甚少提及。

對共匪這種「不友好」的行動，蘇俄採取什麼態度呢？直到目前匪俄衝突擴大後，我們才知道它曾採取了激烈的報復手段，但在當時我們祇知道：

(一)塔什干的維語廣播停止；這是幾十年來從沒有過的現象。

(二)蘇俄通往新疆的口岸、行旅受到嚴厲檢查。俄方說，這種檢查爲的是防止帝國主義間諜滲透破壞。

(三)停止經濟援助，撤退僑民和顧問。

### 第三階段

三、第三階段——衝突擴大、蘇俄進行顛覆；針對共匪在新疆的嚴厲措施，隨着匪俄矛盾之日益擴大，蘇俄對新疆實行兩項對策：

(一)實行經濟封鎖：共匪入新以後，一切經濟措施均以蘇俄爲核心，造成一種附庸經濟。因此，蘇俄針對此種弱點，嚴格實行經濟封鎖，如停止工業合作，使許多工廠因資金、機器、技術等缺乏而停工或減產；斷絕貿易關係，使新疆的一些土產必須經過長途運輸，以內地爲市場，無形增加產品之成本；所需日用品需要由內地供應，無法不提高人民負擔。此外在農牧業技術與生產資料方面，因缺乏援助加深了農業之困難；凡此均使新疆之經濟日益窘困，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因而激發人民之不滿，加深匪僞統制之危機。

(二)進行顛覆活動：蘇俄掌握共匪在新疆遭遇之困難，運用其具有歷史性的強大潛力，展開對新疆匪僞政權的滲透和顛覆。此項活動係以北疆之伊犁與南疆之喀什爲基地。散佈分離主義思想，鼓起反匪武裝暴亂，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先後在喀什和莎車發動局部暴亂，焚毀糧倉，捕殺匪幹，并要驅逐漢人離開新疆，這兩場暴亂分別被匪救平，蘇俄駐在喀什之領館也被迫關閉。五十一年五月，當港、澳發生難民潮時，新疆也傳出大批難民西入俄境的消息

由於鐵幕低垂，對此項消息無法證實，不過從下列事實，可以看出匪俄關係更加惡化：(一)五月四日有蘇俄依留申十八型客機一架，未經預報飛經喀什上空，匪喀什民航局即命令該機折返，該機未理。次日匪北平民航局電喀什站，爾後俄機未經預報飛臨空時，必須強迫折返。(二)同年十月匪印邊界發生戰爭時，匪軍之補給悉經長途由內地運新入藏。蘇俄不僅未予新疆匪軍任何幫助，且在中蘇邊界製造越界事件，使情況非常緊張。於是共匪加強邊境戒備并嚴禁俄機經新疆上空飛往印度。

本年元月起，匪又展開對「分離主義」之攻擊，元月份出刊的匪「人民文學」轉載維吾爾詩人鐵衣甫江·艾里耶夫的「柔巴衣」，匪「人民日報」和匪「詩刊」多次轉載已故維吾爾詩人里·莫托列夫的遺作，并說明新疆人民有歷史性地反對帝國主義所操縱的「分離主義運動」。這種徵兆，充分顯示新疆又發生分離主義的騷動。

隨着上述徵兆，我們又發現甚多異兆：

從二月十四日到四月十八日，共匪的地方廣播一連六十三天對新疆消息隻字不提。到四月十八日開始發佈迪化和南疆的新聞，直到五月初才有「哈薩克自治州」的消息。與此同時我們還獲知共匪嚴禁匪軍眷屬前往三區，且正派大量正規軍在民兵的配合下日夜出動，搜捕「反動份子」，攔截逃亡人民。這些情況使我們確信新疆北部發生變亂，此項變亂一定與蘇俄有關。到上月間，西方報刊發佈新聞，指出伊犁地區的居民，確曾實行反匪暴動。暴動失敗後，居民攜帶牲畜財物，逃往哈薩克斯坦。共匪認為此次動亂受俄方鼓動，乃封閉駐伊犁之蘇俄領事館，并嚴格限制俄人進入新疆。除此而外，共匪還清算新疆民間領袖，以鎮壓暴亂，但未成功。因為我們對新疆的近況有前述的瞭解，所以深信此項消息絕對正確。

八月一日匪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的一個營約四百五十人嘩變，逃入俄境，獲得俄軍的接應和收容。八月十五日農七、八兩師也有官兵七十餘人逃入俄境。按農四師屯墾於伊犁地區，可能是匪第五軍(民族軍)改編，七八兩師分佈於石河子及攔蘇一帶，係投匪之國軍改編而成。這些部隊，前者最易受俄軍之利用，後者因飽受迫害，時思擺脫，一有機會便反抗。

## 匪俄在新疆的尖銳衝突

共匪對新疆的不安和動亂，除抽調大軍加強邊防外，藉口天氣寒冷，將住在中蘇邊境之匪軍眷屬，遣返原籍，防止官兵逃亡。在匪軍增兵新疆邊境之同時，俄軍亦增兵實邊，加強戒備，雙方關係更趨緊張。

## 肆 結 語

一、匪俄在新疆的衝突，成因簡單，背景複雜。其根本原因，產生於俄帝對新疆之侵略。此種利害，曾被共黨目為資本主義民族思想，缺乏國際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加以鄙視。例如匪出版之「民族研究」第六期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一九一七年俄軍佔領伊犁之歷史事件時，無視於俄帝對中國的侵略，而強調俄軍佔領伊犁的進步意義，說它對新疆的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發生革命性的意義。可是等到匪俄之間發生衝突時，這種利害便成了打擊對方的主要武器。所以蘇俄便利用新狹隘的分離主義思想進行對共匪顛覆，而共匪也打着整體的國族利益招牌予蘇俄以反擊。當然，共匪的暴政也是促成新疆目前的動亂「多形多姿」的一大原因。

二、匪俄在新疆的衝突，已遠超過理論分歧的範圍。西方觀察家對匪俄在此一地區發生衝突的重視，決非無因。同時如就新疆內部騷動的實質以觀，它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種反共鬥爭，但因未得正確領導，致反為蘇俄所利用，變反共為反漢。因此對於蘇俄的狡計，我們必須揭穿，使新疆的反共鬥爭能與我們反攻復國的工作相結合。

三、由於匪俄在新疆發生衝突的歷史深遠，背景複雜，目前是開始而不是結束。設若匪、俄雙方的爭執一日不停，此項衝突將永不休止，且有加劇之絕對可能。九月二十一日蘇俄政府發表的聲明，曾指控共匪犯邊，去年達五千次。俄方屢請劃界，均遭共匪拒絕。共匪的宣傳機構還作出暗示，說過去中蘇邊境的造成，極不公平。蘇俄最後警告共匪，如繼續對俄進行「敵對活動」，將受到決定性的反擊。今共匪既以嚴厲手段對待新疆之反共親蘇及越界逃俄事件，俄國又欲以決定性反擊對付邊界之「敵對活動」，匪俄在新疆的衝突自將日益劇烈。

# 共匪對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風運動

餘生

## 一、當前農村「公社」之問題

農業合作化使共匪加強了對農產品的控制，但並未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是經濟的基礎，農業生產的停滯成爲共匪發展經濟路上之絆腳石。

當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時，共匪在合作化基礎上進一步推行「人民公社制」，最現實的主要目的即在於挖掘勞力數量，提高勞動利用率（包括勞動出勤率與勞動強度），亦即進一步控制勞力以適應採行作物新栽培技術之需要，實現農業生產「大躍進」之計劃。共匪對此當初極具信心，曾高唱「一年等於二十年」之樂觀調子，匪區經濟學者許滌新在說明「人民公社制」的優越性時，具體指出：「（一）由於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及管理民主化之實行，加以家務勞動社會化，和婦女勞動力的徹底解放，勞動生產率將大大提高，估計可較一般高級農業合作社提高二〇%以上。（二）由於人力、物力、和財力的統一使用，由於生產事業的大規模發展，人民公社的公共積累將可更大地擴大，開始推行之年，人民公社的公積金，公益金與儲備糧較一九五七年高級農業合作社時期增加四至五倍，這種情形有利於發展公社的生產力，有利於公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三）……公社不但因土地之統一使用，打破了原來農業社的生產局限性，更合理地使用土地，充分發揮土地的潛力，而且因爲資金、勞動力及其他各種資源的統一使用，能够更快地進行規模較大的基本建設，戰勝一切自然災害」。許氏之說明完全基於唯物觀點，殊不知人類爲具有靈性的動物，不

比牛馬可以隨意役使，推行公社的結果，不僅發展農業的前景落空，並且立即招來了嚴重和普遍的自然災害，農業生產急劇下降，農民生活陷於極度困苦，與許氏論斷完全相反。爲挽救農業生產，緩和農民不滿，共匪曾在長期間對「公社」進行整頓，五十年僞八屆九中全會決議推行新的「公社」政策。分析此一政策之精義，主要爲保存「公社」名稱與「公社」制之骨架，生產管理（包括勞動管理）與收益分配等方面則大體上退回至高級農業合作社時期之成規。經過二年來之逐步演變，至今大體已趨定型。

「公社」新政策之實施，已較初期公社較多顧及農業生產之特性與農民個人之利益，理論上應可緩和農業失敗之危機，使農業生產迅速恢復至高級社時期之水平。事實上，由於「公社」「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與集體經營制度依然存在，「大躍進」時期勞力役使過苛，資源浪費過鉅，加以個人對物質利益與選擇自由之嚮往與追求，係由根深蒂固不可泯滅之人性出發，當前農村「公社」依然存在若干問題，茲就其較重要者簡述如次：

（一）共匪目前政策雖將「公社」農副業經營單位縮小，並將過去由「公社」一級獨佔之生產手段所有權與企業經營管理權分別下放，不問以生產大隊抑或生產隊爲基本，均仍爲集體經濟之性質，個人依然隸從於集體，而無選擇之自由，人類對於無選擇自由之事物，不管其本身爲好爲壞，均不可能發生積極之興趣。

（二）「評工計分」，有計件工資之性質，以「評工計分」作爲收益分配之方法，一方面固將使農民工作重量不重質，但同時亦可較定額工資收到多勞多得，因而多少具有刺激農民生產意願之作用

。但農事操作主要依賴經驗，技巧與體力，且受自然條件與氣候變化之影響，工作定額不容易訂得正確，因此，評工記分亦自難做到公平合理，農民在集體支配之下從事勞作，互相對比，將無一不感覺自己處處吃虧，爭論永無休止，勞動熱忱為之大受妨礙。

(三) 集體經濟制度在分配上既無法正確體現農民個人當前利益，同時復杜塞農民「生產發家」與「勞動致富」之未來希望，人性好逸惡勞，惟有「當前大利」與「光明遠景」方能鼓起其生產之熱忱，堅定其勤奮之意志。「公社」中兩者均不具備，因而農民對集體經濟完全喪失信心與興趣，即今天時正常，在自由經營制下，一般均可達成豐收，在集體制下，因農民無心對作物加以周詳之管理與照料，遂使資源浪費（特別是水資源），農時違誤，不僅不能豐收，並且難免導致減產。如天時稍有不正，在自由制下，可由農民憑藉遠慮與勤奮，獲得適當之補救，而在集體制下則必然引起可怖之災歉。

(四) 共匪目前「公社」政策准許社員於參加集體生產之餘可以從事部份私人經濟活動，原係被迫對農民所作讓步之一時的原則例外，且係以集體為主，私營為輔。但此項政策能使農民在集體經濟之汪洋大海中獲得一個可以躲避風浪衝擊之小島，農民對此極為關切，無不愛護備至，幾乎將全部家肥與極大部份時間投入私營經濟，即自留地家庭副業及農村集市貿易三者之中。年來私營經濟發展得很快，即是基於此故。與私營經濟相較，集體經濟即無此種吸引作用，故目前農民均不願將家肥施用於「公田」，對集體經濟勞動出勤率亦日益降低，相習成風，一般已較組織規定必須參加之基本勞動日數降低二〇%至三〇%，個別情形竟有降低七〇%。且因晨昏又須抽空努力私營經濟之操作，對集體經濟出勤時，大多已感精疲力倦，勞動效率隨而低落，已非幹部之監視所能為力。農業操作具有分散性，本來亦不如工廠車間集中勞動之易施監督。且事實上隊級幹部本身亦與農民一樣均醉心並瘁力於私營經濟之操作。另一方面「公社」雖准許農民從事私營經濟，但因自留地多為劣等土地，其面積又僅及耕地面積五%左右，私墾之邊角土地即所謂「十邊土地」則僅為耕地面積二%左右，兩者合計也不過七%。連同家

庭副業生產在內的私營經濟，在共匪所控制的全部農村經濟中僅佔二〇%左右，農民眼前利益與發展前途實際均受到嚴格之限制。農民感於私營規模過小，無法舒展抱負，已普遍發出「土地分到戶，農忙搞互助，農閒自顧自」之呼聲。私營經濟在目前對集體經濟有補助之作用，亦有抵觸、腐蝕與破壞之作用。匪區農業生產依靠集體經濟，集體經濟與「公社」不能分開，年來集體經濟據匪自稱已有進步，但全部農業生產尚未能恢復至高級農業社時期之水平，則可斷言。目前「公社」與「集體經濟」，均仍在苦撐之中。

前述四項問題，均係基於人性之流向與反人性之集體制劇烈抵觸而發生，其削弱集體經濟，殆屬無可避免。

## 二、偽十中全會後共匪對公社之「整風」

共匪農村「公社」政策，助長私營經濟之抬頭，因而動搖集體經濟之穩定。五十一年九月偽八屆十中全會公報曾經指出：「有一批生產隊由於領導人不得力因而招致農業減產，或者不受羣眾歡迎，同時社會上還存着一部份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一有機會即企圖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會議對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問題，通過了決定。決定內容如何，未見披露，但所謂「階級鬥爭」則接着即在部份地區開始推動，本年春季全面展開，入夏以後仍在繼續進行。

共匪實施偽十中全會所謂「階級鬥爭」乃係一種整風，與過去整社情形略有不同。整社所致力者主要為制度之修改或政策之變更。整風所致力者則主要為風氣或作風之改正，既不修改制度，亦不變更政策（目前政策前進既無可能，後退亦非所願，在短時期內事實上不可能有所變更）。整風所採方法為推行「社會主義教育」即洗腦工作，「社會主義教育」之中心則為展開兩條道路的鬥爭與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此項教育以「公社」幹部為主要對象，同時亦要求「農民認清當前形勢，認清社會主義方向，用農民親身看到的事實講解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教育農民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自覺地服從國家利益，自覺地抵制農村中

某些落後習慣和不良傾向，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為即將到來的農業生產新高潮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總括言之，此次整風係由於個體私營與集體公營經濟之劇烈衝突而起，其根本目的亦即在抑阻個體經濟之過分膨脹，維護集體經濟之安定，並促進集體生產的增加。

此次整風雖係對整個「公社」而發，但主要仍以幹部為對象，對幹部整風的重點工作，為徹底清洗幹部，以加強生產隊核心領導，在改選幹部中以貧農與下中農作為選拔新幹部為基本標準。年來幹部厭棄集體經濟，暗中搞私營活動者多不勝數，自屬整不勝整，故被清洗之幹部各地均以此作為典型示範，一般幹部則重在施以社會主義教育，並以階級鬥爭教育為中心。原有幹部及新進幹部均被迫參加生產勞動，使起對羣眾之帶頭作用，並藉以培養社會主義思想。

對於農民羣眾方面，在整風過程中，除普遍接受社會主義教育外，凡「私自開荒」、「自留地超過規定」、「不參加或少參加集體勞動」等均被指控為「破壞集體生產」、「破壞社會主義利益」、「抗拒出勤」等罪名而被鬥爭，低頭認罪者不准再犯，態度曖昧或屢犯不改者則加以處分，作為典型，農民在整風鬥爭中最重有被判處勞改或徒刑者。另一方面，共匪復在農村中發動「三好」、「五好」、「六好」等運動，作為對農村廣大社員（包括幹部）進行生動的思想教育之有效方法，目的在於表揚積極嚮往於社會主義的人物與事蹟，發動社會主義競賽，以提高農民與幹部對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努力參加集體生產。所謂「三好」有「民主辦社好」、「幹部思想作風好」、「黨的支部好」，所謂「五好」有「五好社員」、「五好幹部」、「五好生產隊」等，要皆利用羣眾的虛榮與怕事心理，欺騙與裹脅兼施而已。

至於外間所傳共匪對「公社」組織已再度將權力集中，合併生產大隊，取消自留地，恢復至四十八年時之體制，迄無事實足以證明。私營經濟之發展，一方面為人性流向之所趨，同時亦為「公社」政策之當然產物，清洗與鬥爭僅能使幹部與羣眾懾服於一時。競賽等雖雷厲風行，當亦僅能起為時甚暫之強心作用。羣眾久經共匪洗腦，其抗毒能力亦已不斷提高，社會主義教育與階級鬥爭教育終將無法起集體經濟之沉疴。

# 上海印刷廠

## 承印

五彩封面

雕刻銅版

平印凹印

書報雜誌

各色套版

商標表冊

英文印件

## 優點

## 缺點

新型機器

設備完善

交貨迅速

價格克己

如蒙賜顧

竭誠歡迎

### 彩印分廠

### 總廠

地址：北台市武昌街一八八號  
電話：二一九〇九

地址：北台市臨沂街五號  
電話：二六四七



# 本年大陸小麥收成的觀測

覺 生

大陸主要冬小麥區已於七月初旬收割完畢。青海、內蒙等地也在八月初開鐮收割小麥。共匪「新華社」於七月四日揚言「小麥主要產區多數地區的收成比去年好」；強調「從山東、河南、陝西、河北、山西、安徽等省打場脫粒的情況看，大部份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小麥產量超過去年」。但也承認「四、五月份安徽、江蘇、湖北、山東、河南等省有些地區降雨偏多，部份麥田受澇，經多方搶救，收成仍受到損失」。與此同時，共匪復揚言上半年支援農業物資大量增加，諸如上半年化肥產量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四十二；製造氮肥設備增加六倍；出廠拖拉機增加百分之三十；農用排灌水泵增加一倍等等。極力渲染農村生產形勢昂揚，描寫豐產景象。從客觀形勢觀察，今年共產對農業的支援確實全力以赴，農用物資的增加，自為其促進生匪的積極因素。但上半年大陸旱澇災害仍未減輕，人的因素也無積極意向。所以麥收情形是否如共匪所說的「比去年好」，大有疑問。本文擬就大陸小麥分佈、種植情況及本年旱澇災害對小麥幾個關鍵性階段的影響等不利因素，作一全面分析，以揭露共匪虛偽宣傳。茲分述如次：

## 一 大陸小麥生產的分佈情況

大陸小麥分佈極為廣泛，西起海拔三千八百公尺的高寒地帶，東迄於海；北起松花江，南至海南島，均有小麥種植。惟以豫、魯、皖、冀、蘇、陝、甘、晉、川、鄂、黑、蒙、新等省麥田較為集

本年大陸小麥收成的觀測

中。以上十三省區麥田面積，合計佔全大陸麥田總面積百分之九十左右。大陸小麥種植，一般分為春麥與冬麥兩區，其中春麥區又分為東部春麥區和西部春麥區；冬麥區則分為北方冬麥區與南方冬麥區。就種植面積和絕對產量言，主要以冬小麥佔絕大部份；就單位面積產量言，則春小麥畝產量略高於冬小麥。例如民國四十六年，在四億零九百多萬畝小麥中，春小麥祇佔百分之十一強，產量則佔百分之十二點五。故匪區小麥產量，純以冬麥豐歉為其決定關鍵。

大陸春麥與冬麥區的劃分，係以長城、六盤山和大雪山為界。長城以南，六盤山、大雪山以東為冬小麥區，以北以西為春小麥區，但這一劃分也無完全嚴格界線。例如河北懷來、涿鹿等縣在長城以北，仍多種冬麥；山西忻縣專區在長城以南却多春麥。另新疆則為冬麥春麥兼種區；吉林敦化、蛟河等縣和西藏部份地區也多種冬麥，春麥比重反較冬麥為少。

(一) 北方冬麥區 在長城以南、六盤山以東、秦嶺、桐柏山和淮河以北的地區。包括山東全省、山西忻縣以南、河北長城以南、陝西關中及綏德、榆林以南、甘肅平涼、天水、以及河南、江蘇、安徽的淮河以北等地區。這些地區小麥種植面積一般佔耕地百分之三十左右，個別地方則佔百分之五、六十不等。例如民國四十五年河北冬麥種植面積約佔耕地面積百分之二九點一；山東佔四六點二；河南佔五二點二。四十三年陝西寶雞專區佔六九點八、渭南專區佔五〇點四。根據共匪統計，民國四十四年，北方冬麥區麥田面積佔全匪區麥田總面積百分之六五點八。單位面積產量僅及全匪區

平均畝產量百分之九六點一七。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八年平均每畝生產小麥九十五市斤。

(一)南方冬麥區 在秦嶺、桐柏山、淮河以南和大雪山以東的地區。包括江蘇、安徽、河南等省的淮河以南地區、陝西漢中、四川松潘草地以東和南方其他省區。根據共匪統計，民國四十四年南方冬麥區田面積約佔全匪區麥田總面積百分之二二點八。每畝單位面積產量為全匪區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一〇三點七。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五年間平均每畝產量為九十市斤。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平均為一一〇市斤。這一地區，小麥種植主要集中於四川、湖北、及皖、蘇、豫的淮南部份。其餘湘、贛、浙、閩、粵、桂、黔、滇等省，小麥種植面積一般佔不到耕地十分之一。

(二)春麥區 在長城以北、六盤山、大雪山以西地區。民國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小麥種植面積僅佔全匪區麥田總面積百分之一一強。單位面積產量則相當於全匪區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一二四點五六。其中東部春麥區產量較低，播種面積也較少，且呈逐年縮減狀態。以民國四十五年為例，遼、吉、黑三省春麥每畝平均產量依次為五六點七市斤、三六點四市斤和一二二點七市斤。小麥種植面積佔各該省耕地面積依次為百分之一點八七、一點四一和一二點三四。另以民國四十一年小麥播種面積為一〇〇，則東北三省小麥播種遞減情形如下表。

省區	一九五二	一九五三	一九五四	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	備註
遼寧	一〇〇	九九·四	一二七·三	八一·一	四九·〇	
吉林	一〇〇	八一·八	九九·八	八五·五	一四二·二	
黑龍江	一〇〇	九〇·八	八七·一	六〇·六	五七·八	

西部春麥區，包括青海、新疆、甘肅六盤山以西地區和內蒙古等地區。單位產量較高，播種面積也較多。據共匪統計，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八年間，上述四省春小麥畝產量平均為一二八市斤。以民國四十五年為例，其種植情況如下表：

省別	小麥每畝平均產量(市斤)	麥田佔耕地百分比	一九五六年麥田面積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比	備註
青海	二二六·二	三七·三一	一三二·二	
新疆	一九三·〇	五〇·九七	一三七·七	
甘肅	一七一·〇	三六·四六	一一二·五	全省
內蒙	一二八·〇	一三·一〇	一〇八·〇	全省

根據以上所述，可見大陸小麥生產不僅是決定於冬小麥區，而且主要是集中於豫、魯、皖、冀、蘇、陝、甘、晉、川、鄂、黑、蒙、新等十三個省區。這些省區小麥播種面積及單位面積產量如下表：

省區	小麥播種面積	平均每畝產量(市斤)
河南	六七〇〇多萬畝 (一九五八)	八〇·八 (一九五〇)
山東	五八〇〇多萬畝 (一九五六)	一一三·一 (一九五七)
安徽	四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五六)	二二·九 (一九五〇)
河北	三五〇〇多萬畝 (一九五六)	一〇·九 (一九五五)
江蘇	三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五六)	一〇·四 (一九五四)
陝西	二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七二 (一九五〇)
甘肅	二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一一五·六 (一九五五)
山西	一三五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九二·八 (一九五〇)
內蒙	一三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一一九 (一九五六)
青海	一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一七一 (一九五六)
新疆	一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一七〇 (一九五五)
西藏	一〇〇〇多萬畝 (一九六三)	一七〇 (一九五五)

四川	一〇〇〇萬畝以上	二二·七	(一九五〇)
湖北	一〇〇〇萬畝以上	四六·六	(一九五〇)
黑龍江	一〇〇〇萬畝以上	九四·五	(一九五〇)
內蒙古	一〇〇〇萬畝以上	一三·二	(一九五〇)
新疆	一〇〇〇萬畝以上	一二·七	(一九五六)
		二八·二	(一九五六)
		一九三	(一九五六)

## 二 冬小麥的種植情形

大陸冬小麥播種，最早的開始於八、九月，最晚則遲到十一月下旬。就各個地區言，大量是河北北部、陝西和山西中北部在九月中旬至下旬播種；華北平原為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長江流域為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華南為十一月中旬至下旬。其成熟期一般在五月至七月。兩廣及福建則在二、三月就開始收割。收穫較早的冬小麥，生長期祇一百多天，但新疆部份地區小麥生長期則長達三個月。茲列舉各地冬小麥收穫日期如次：

廣東	二月二十日—三月卅日	河南	五月二十日—六月十日
廣西	三月二十日—四月十日	陝西	五月二十日—六月十日
福建	三月廿五日—四月卅日	江蘇	五月二十日—六月十日
四川	四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	安徽	五月二十日—六月十日
雲南	五月一日—五月十日	山東	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日
貴州	五月一日—五月三十日	山西	五月廿五日—六月二十日
江西	五月十日—五月三十日	河北	五月三十日—六月二十日
湖南	五月十日—五月三十日	遼寧	五月二十日—七月十日
湖北	五月十日—六月十日	甘肅	六月廿五日—七月三十日
浙江	五月十五日—五月卅日	新疆	六月廿五日—七月三十日

如前節資料所示，大陸四億畝小麥，約有二億六千多萬畝集中

於豫、魯、冀、晉、陝、蘇、皖等省，即所謂北方冬麥區。這一地區處於七百五十公釐等雨線以北，愈北雨量愈少。一般說來，其年雨量雖可達五百至七百公釐，但因雨變率甚大，全年雨量約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集中在夏季，冬春雨水稀少，與小麥生長期間的需水要求，發生甚大矛盾。

根據共匪試驗調查，冬小麥自九月中下旬播種到次年六月收穫，其整個生長期總耗水量約為四百至六百公釐。各生長階段的耗水量大致如次：

生長階段	天數	耗水量(公釐)	佔總耗水量%	備註
播種到出苗	一	一〇	一·九	
出苗到分蘗	六	二九	五·九	
分蘗到拔節	八	四三	八·五	
拔節到抽穗	三	一〇	二·一	
抽穗到開花	二	七	一·四	
開花到收穫	三	二〇	四·一	

上表雖然顯示冬麥需水最多為拔節後到乳熟的六十三天(約佔總耗水量百分之六十六點六)，但播種前期和分蘗到越冬階段，也為重要關鍵。據瞭解，冬小麥在九月播種後，須吸收相當於本身重量百分之五十的水份，始有發芽可能；播種後十天，土壤含水率如果在百分之十六以上，出苗率可達百分之七十五，如果土壤含水率在百分之十左右，則出苗率將降低至百分之〇點五。其次，在十一月冬小麥分蘗到越冬階段，如果在零至二十釐米的土層內，土壤水份不能維持在田間最大持水量的百分之六十至九十，即會影響冬麥的安全越冬。再次是次年三、四月小麥拔節階段，如果水份不足，麥穗即會變小，小穗數和小花數也隨之減少。也就是說，冬麥播種前和分蘗到越冬階段以及拔節季節為需水最迫切的三大關鍵期。淮北農諺所謂「三月得雨，稀麥變稠麥」，又謂「麥收八、十、三月雨」，意即農曆八月播種前後，十月越冬前和來年三月返青拔節

期，各下一場透雨，就能促使小麥豐產。近年共匪總結出所謂凍水、拔節水、抽穗水和灌漿水為麥田灌溉的關鍵，就是以此為根據。在瞭解冬麥各個時期的需水情況以後我們再就北方冬麥的降雨情形作一探討。據共匪吐露，在黃河以北冬麥區，夏季雨水約佔全年總降水量百分之七十以上，冬季不足百分之五，春、秋兩季僅各佔百分之十。黃淮之間，夏季雨量約佔全年一半，春秋各佔百分之二十，冬季祇佔百分之十。即黃河以北，春季降雨量不過四十至七十公釐，黃淮之間不過一百八十公釐。再以個別地區為例，北平地區常年平均降水量約七百公釐，但多半集中於七八月間，在冬麥生長的九個月中，降水量一般不足二百公釐。華北平原降雨情形也大致如此，九月至十一月僅佔全年雨量百分之二八點八，十二月至二月佔五點三，三至五月佔一四點，六至八月則佔六二點一。即在冬麥整個生長期中，也祇有二百多公釐雨水。可見北方冬麥區的降雨情況與冬麥需水要求十分矛盾，所以單位面積產量一向極低。從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八年間平均每畝產量不過九十五市斤，與西歐各國比較，如丹麥平均畝產四九七市斤，荷蘭四八四市斤，比利時四〇八市斤，西德四〇三市斤，英國三九二市斤，實在相去甚遠。

從農學觀點言，年雨量在七百五十公厘以下的地區從事農業種植，原已十分不利。大陸北方冬麥區雨量不足而仍能成爲我國的主要產麥區，過去係依靠人力戰勝自然，如以伏耕、鎮壟、壓壟及人工灌溉等傳統方法對抗乾旱缺水，即其一例。也就是說，北方冬麥區一向比較乾旱，運用人力可以相對地加以補救。但這也不表示長期的乾旱仍然可以保收。就冬小麥生長的需要言，播種前至越冬前適量的雨雪及拔節期間的春雨，仍爲基本條件。如果長期乾旱，除非具有好的灌溉條件，否則仍難避免嚴重減產。這就是就大陸災情判斷匪區麥收豐歉的基本前提。

### 三 上半年各種不利因素

大陸小麥產區，除每年常受乾旱威脅外，四五月小麥拔節期間，也常因西伯利亞寒流侵襲造成霜凍災害。同時小麥揚花及乳熟期間，雨季逐漸開始，又常因暴雨成潦而使小麥倒伏霉爛。尤其六月

麥收之際，雨季全面開始，多雨天氣每每釀成麥收雨害，造成損失。北方麥區農諺云：麥收有五忙，割拉曬碾藏，拉在場裏一半，放在囤裏才算。」就是指麥收雨害極易造成麥粒發芽霉爛等損失而言。又云：「麥收有兩忙，天晴、天下，八成割十成收，十成割八成收。」所謂「天晴」「天下」，就是指晴天八成割等於十成收，下雨天割麥則十成割等於八成收，也指麥收雨害而言。例如民國四十五年，晉、豫、蘇、皖等省即因麥收下雨損失小麥五十億斤。霜凍方面，從民國四十一年以來，一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萬畝以上的麥田遭到凍害，四十二年則達一億畝，五十一年更達二億多畝。如前所述，大陸麥產區兼備諸多惡劣條件，過去主要係依靠農民的傳統經驗抓緊農時及依靠其辛勤勞動，以抗拒自然威脅，使災害損失得以減至最輕程度。共匪竊據大陸後，情形已完全不同。第一，過去十三年共匪所謂改善農田灌溉，顯然仍不足以抗拒乾旱威脅，這是共匪也不否認的事實。第二，對於春霜凍害及麥收雨害，迄今共匪也束手無策。第三，在實踐傳統經驗方面，由於極權暴政的影響，農民已失去關切生產的情趣；人民公社領導匪幹又多半不懂農事，每遇災害發生，不僅坐失農時，降低抗災作用，甚且因指揮調度失當而招致人力物力的額外損失。所以近數年來，大陸小麥生產，每因人爲因素而加重災害損失。本年情形亦復如此。

(一) 就旱災分析 自去年八月以後，大陸各省普遍少雪缺雨。本年春季，乾旱更甚。至三月底止，全大陸二十七個省市區均受乾旱威脅。據匪中央氣象台吐露，去年十一月份總降水量，除黃河中下游以南地部份地區稍多外，東北、華北不足五公釐，西南少於二十五公釐，均比常年同期雨量減少五成。十二月份，淮河流域和長江下游雨量則比常年同期減少二至四成，華南、西南減少五至八成，西北、華北、東北及內蒙則終月無雨。今年一月份，除東北北部地區降雪一至三公釐外，全大陸其他省區均無雨量。二、三月份以後，除黃河中游、長江中下游及淮河部局地區下過中小雨外，其他省區仍然乾旱。三月九日匪「人民日報」曾供稱，「華北北部、包括河北中北部、北京全部、山西北部、內蒙古東部、中部及西北地區，從去年秋天以來，一直雨雪稀少，連續乾旱達八個月之久，主

壤失墒情況極為嚴重。」又稱：「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廣東、福建、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區，總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減少三成到九成。」這些省區也連續乾旱八、九個月。至四、五月份，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麥產區，又因持續陰雨由旱轉澇。東北、華北、內蒙及西南則仍繼續乾旱。再就長江以北幾個主要產麥省份觀察，例如：(一)北平郊區乾旱達九個多月，全區五分之四的耕地失墒，土壤含水量多在百分之十以下。(二)河北省從去年八月至今今年六月，一直乾旱，保定和唐山兩專區分別有四分之三和五分之二的耕地失墒，張家口專區主要河流量比往年減少三分之二，匪稱全省小麥「從播種到返青拔節，一直受着嚴重的乾旱威脅。」(三)山西省，從去年七月起，持續乾旱十個月，晉北地區受旱耕地達一千七百萬畝。(四)陝西省，從去年冬麥開始，大部份地區滴水未降，乾旱持續五個多月。(五)山東省、湖北省及安徽省、江蘇省的淮北地區都持續乾旱，尤其淮河以北的冬麥區和長城以北的春麥區，乾旱更甚。

(二)就雨澇災害分析 今年四、五月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產麥區，雨澇情形也十分嚴重。冀、魯、豫、皖、蘇等省連續陰雨且延續到麥收期間而造成麥收雨害。例如：(一)江蘇省：匪稱「從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五日連續陰雨，蘇南、蘇北相繼出現三次暴雨，雨量比一九五四年(按即江蘇大水災年)大上三倍。」鎮江、揚州、淮陰、鹽城、蘇州五個專區普遍發生澇災。據匪江蘇人民委員會「在關於突擊排澇的緊急通知」中稱，蘇州專區二百八十萬畝，一直到六月初小麥收割期間，仍然陰雨，內澇也未排乾。匪稱蘇州專區參加突擊搶收小麥的匪幹、專、縣兩級佔百分之七十，公社大隊兩級佔百分之九十。足見情形非常嚴重。(二)安徽省：匪稱「從四月中到五月初，各地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多一倍到二倍，而持續時間則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全省自皖北宿縣南迄蕪湖安慶，農田多半受澇。五月中旬，匪吐露各地排乾受澇農田面積，計蕪湖專區二十多萬畝，蒙城縣三十五萬畝，巢縣七萬多畝，宿縣二十三萬畝，歙縣二十多萬畝，蕭縣二十三萬畝，靈璧縣十萬多畝，壽縣四萬六千多畝。至六月中旬，又稱「爲了適時收割麥子，在排除了麥田積水之後，立即組織社員收割成熟小麥，部份麥田積水過多，一

本年大陸小麥收成的觀測

時無法排乾，就組織社員涉水收割。」足見災情也十分嚴重。(三)河南省：自四月中旬以後，也陰雨連綿，一直到七月中旬，豫東南仍陰雨未停。五月底匪稱「信陽專區已有三百多萬畝麥田排除了積水。」杞縣、開封、尉氏、通許、蘭考等縣也及時組織社員將麥田的積水排乾。」又稱「從五月十八日起，商邱專區有十個縣連降大雨，雨勢兇猛，排澇不及，低窪地區積水成災，部份村莊被水沖毀。」六月初割麥期間，匪又稱南陽、商邱、新鄉、洛陽、許昌等專區爲搶收小麥，許多生產隊在麥田增造打麥場，力爭熟一塊收一塊，隨收隨打，一時不能打的就架好用蓆子蓋好，防止霉爛。(四)山東省：匪稱「五月十八日到二十六日(按即山東刈麥期)」，山東境內連續降雨，全省平均雨量達六十九毫米，荷澤、聊城、德州、濟寧等地區降雨較大，一般都在一百毫米以上。僅荷澤專區受澇麥田即達七十萬畝。匪山東省專區及縣級匪幹以及學生匪軍等均被動員參加搶收小麥。(五)河北省：匪稱「南部集中產麥區的邯鄲、邢台、石家莊、衡水四個地區的一千萬多畝小麥正要收割的時候，陰雨綿綿，對小麥生產豐收極爲不利。」又稱專級匪幹多數被派深入生產隊領導搶收小麥。(六)陝西省：自五月初旬，由於甘肅境內暴雨，關中涇、渭、洛三水山洪暴發，農田被淹一千一百多萬畝，並有十四個村莊被沖毀。另陝南安康專區漢水上游也暴雨成澇；延安專區則於三、四間連遭凍害。(七)其他地區，如山西省萬榮、榆次、太谷、離石等地，內蒙古河套地區及湖北省襄陽、黃岡、孝感等專區，自五月以後也因雨成澇，並在三、四月份發生低溫凍害。

(三)就人的因素分析 共匪容許個體經濟並存之後，雖然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情趣，但這種情趣主要表現在個人經營方面，對集體經濟則無多大作用可言。例如：(一)今年共匪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和「反自發鬥爭」，雷厲風行，持續半年以上，接着又在大陸開展所謂「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運動。目前正企圖以大講「家史」「村史」「社史」等方式，鼓起農民「熱愛」集體經濟的情緒。(二)人民公社出勤率仍普遍低落，如春耕期間廣東多數公社出勤率低至百分之七十、三十，甚至低到百分之十。(三)今年上半年，全大陸普遍流行着「吃飯靠集體，用錢靠自己，發財靠投機」的口號，大批社員棄農經商，進行投機買賣。至於匪幹方面，在前一時期所

謂「反自發鬥爭中，共匪已公開招認部份匪幹與農民合流，埋頭個人經營，放鬆生產領導。最近共匪在動員匪幹參加勞動中，又供認農村匪幹「生活特殊化」，「甚至逐步蛻化變質」。例如七月份匪「紅旗」半月刊在「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論中供稱：有的匪幹「光說不練」「口講不幹」；有的「官僚主義」「麻痺大意」「放任自流」；有的「不鑽具體業務、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思想工作」；有的「革命意志衰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遇事推諉，不負責任，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多吃多佔」「不關心羣衆痛癢」；有的「一對羣衆實行強迫命令，壓制批評，濫用權力，違法亂紀，甚至站在羣衆頭上，稱王稱霸」。六月二日匪「人民日報」在「幹部參加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的社論中，更強調所謂「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幹部」的問題。又稱「口說十遍，不如帶頭一幹」。這又充份反映了農民對集體生產情趣的瓦解，已經到了沒有匪幹帶頭強制便無法推動工作的地步。以上所舉例證，不但說明人的因素迄無積極意向，甚至可以說明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衝突，比過去更爲嚴重。

#### 四 結論

大陸幅員遼闊，在正常年景，每年常有數以千萬計的農田受災。由於南北兼備寒溫熱三帶，不同地區糧食作物各個生長階段相差頗大；比如甲地正在播種，而乙地已臨收割。故觀察災害損失，須結合當地糧食作物生長情況，始能判別其輕重程度。本文前兩節詳述大陸小麥分佈情況、各地小麥播種、收割日期及其整個生長期中最忌旱澇霜凍的幾個關鍵階段，主要目的即在便於對照說明。

根據前述資料顯示，去年八、九月到今年三月底，大陸南北各省均呈缺雨狀態，其中東北、內蒙、華北和華南、西南各省，早情一直持至六月底始稍緩和，這說明各小麥區從播種到越冬再到返青拔節，三個最需水的階段，均受乾旱威脅。這樣長期的乾旱，除非具有良好的灌溉條件，否則欲其正常生長而求保收，顯無可能。以北方冬麥區言，小麥播種面達二億六千萬以上，普遍灌溉，尤非共匪現有的能力所能做到。可見北方冬麥區今年必將因乾旱而嚴重影響收成。其次四月以後，蘇、皖、豫、魯、陝、晉、冀、鄂等省，

在小麥最忌患澇的乳熟階段，又先後發生內澇災害及麥收雨害。這些省區乾旱在前，內澇在後，造成小麥倒伏霉爛，從共匪承認「經多方搶救收成仍受到損失」一節，不難見出其損害之嚴重。

再就受災地區分析，豫、魯、皖、冀、蘇、陝、甘、晉、川、鄂、黑、蒙、新十三個省區，麥田面積約佔大陸麥田總面積百分之九十左右。今年這十三個省區，除新疆氣候較正常和四川旱情較輕外，其餘十一省區乾旱或內澇均甚嚴重。也就是說，除新疆、四川兩千多萬畝小麥可能較正常生長外，其餘十一省區三億多畝小麥災情既不輕微，人的因素亦未見積極跡象，其必歉收，自無疑問。

大陸自然條件複雜，農田土質、灌溉、施肥及其他耕作條件差異甚大，糧食收成極不平衡，故在豐收年中，個別地區可能出現歉收，在荒年中，個別地區也可能出現豐收。今年以來，共匪以全力支援農業，當然有其積極因素及作用存在。所以在一部份耕作條件較好和配備有機電排灌的地區可能相對保收或在少部份社隊達成增產，這種可能性我們不能一概抹煞。但今日能具備多種優良條件的生產隊，究屬少數中的少數。因此，從總方面觀察，今年大陸小麥收成的實際情況，應是少數保收或增產而絕大多數減產。如與正常年景比較，其減產幅度當在三成以上，與去年比較，增產的可能性也極少。共匪所謂「小麥主要產區多數地區的收成比去年好」和「大部份人民公社生產隊的小麥產量超過去年」。顯然不是事實。這一論斷，除以災害及人為因素作根據外，尚有下列三項事實可爲佐證：（一）今年共匪夏糧徵購跟隨割麥同時進行，但據共匪自稱，截至七月底止，除四川、湖南、河北、山東四省完成徵購計劃外，其他各省，特別是幾個主要產麥省份，都祇有部份專區、縣或公社、生產隊完成徵購任務。夏糧徵購停滯不前，當然與小麥歉收有直接關係。（二）麥收甫告結束，各地即在動員農民擴大夏種面積，企圖以秋補夏，即使在所謂豐產的地區或社隊也不例外。（三）麥收之後，共匪仍要求農民「計劃用糧」「節約用糧」。強調「要算了才吃，不能吃了才算」。糧食的缺乏，當然也反映小麥收成不佳。大陸小麥產量雖然祇佔糧食總產量百分之十幾，但小麥屬於細糧範圍。今既再度歉收，顯然不利於共匪的糧食控制與分配，糧荒也將繼續加深。